本論文獲得法務部司法官學院115年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

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沈伯洋 博士

周愫嫻 博士

# 被害者也有預設值？

## ——散佈性影像中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研究

Default Settings for Victims? — A Study on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in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研究生：林郁琤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NTPU

# 謝誌

*當你處在一個巨大的體制裡，你很容易產生安逸感。*

*儘管這個體制並不公平，或甚至是惡意的、自私的，只服務不包括你的特定少數人。*

*但我們依舊樂於接受它。*

*因為體制代表安定、代表千篇一律、代表一切可以預期。*

*你覺得服從體制你就不會出事。*

*——《沉沒意志》遊戲中角色 徐媛*

相信各位在閱讀論文前，都會先看謝誌，對吧？那我必須先強烈推薦大家遊玩臺灣團隊熊骨工作室（BearBone Studio）的《沉沒意志（Minds Beneath Us）》這部作品，實在太喜歡了（非業配），喜歡到好想刪除記憶重玩一次，喜歡到差點轉換跑道（咦）。噢對了也先提醒各位，我名字的最後一個字讀作「ㄔㄥ」。

好吧回來，雖然知道大家都想從謝誌當中窺知該位學生的生命經驗，或是撰寫論文的小撇步與心路歷程，但，晚點，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別急。一篇碩論的完成，首當其衝該感謝的，除自己（一定不能虧待自己吧）之外，想必就是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

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很幸運能夠應屆畢業，很幸運能夠遇見好多優秀的老師，很幸運能夠擔任沈伯洋老師（我都叫他撲哥）的課程助理（撲哥真的是一位好老闆又聰明又善良又帥氣實在不得不愛）（不是那首不得不愛），很幸運能夠受到周愫嫻老師的青睞從而積累許多難能可貴的學習經驗（周老師我對您的愛無法言喻您懂的），很幸運能自林育聖老師身上習得量化研究技巧與可口可樂分類（以及各種有趣的研究方向...XD），很幸運能找到氣質滿點的官曉薇老師擔任口委（猶記得第一次口試時初見曉薇老師的剎那直接當場成立粉絲團）。這篇論文，多虧有四位老師的建議乃至鼎力相助，榮幸之至亦萬分感激。

同前所述，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從大學到研究所，一路上遇見許多貴人甚能結識為好友進而成為摯友（下音樂：離開的一路上我沒忘記～），亦使我更加明白何謂緣份。逸騏、斯琪、耕綸，碩班生涯於我心中佔據極大份量（不是物理上的份量）的三人，互相扶持著一路走到現在，沒想到開學當天偶然的同桌竟能勾勒起後續的志氣相投，妙不可言，我會將對你們的愛小心翼翼地置於心底（畢竟我對緣份小心翼翼）；任萱、敏君、

沛琪，也確實是從未想過竟能成為極為熟識的好友，互相扶持互相勉勵，互相幹話來幹話去，這樣的紓壓方式也是蠻不錯的（？）；敏神、宜萱、韻庭、星穎、俐妤、穎雯、蒨昕、旭威，研究所的各位都非常好相處（謎之音：非常好電影～現在我有冰淇淋～），大家也都很樂意分享資源與想法，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班遊才能揪成功（這部分我一直沒揪我的鍋我道歉）；紫婷，應該是我交友圈中最年輕的一位了（是時候感嘆歲月如梭亦如白駒過隙...QQ），有幸能成為你的第一位鋼琴學生，小的日後會繼續努力，拾起這份未竟；宜蓁，於更保會相遇的、莫名很合拍的夥伴，感謝你那陣子總是凱瑞我，也很開心你離自己的夢想又更近了，靜候你的好消息；品慈、安庭、育馨、穎定、佳瑜、亭蓁、晏如，這群碩一的好夥伴，很開心能一起修課一起聊天幹話一起分享各自的所見所聞（此處雙關請自行意會）；玟妤、博丞、培沅、曼婕、冠澤、博為、琇霓、癸君老師、彥和老師、舒茵學姊、惠華助教，謝謝你們將我的實驗問卷分享出去給更多人填寫甚或給予我極大鼓勵與支持，小的實在感激不盡；謝謝每一位受我打擾且願意填答實驗問卷的朋友乃至朋友的朋友們，雖族繁不及備載，但對你們的感謝盡在不言中。

昱彣、昱錡、岫瑾、育瑄、朱驛 yeee、馬克、一德、人平、黃晴、聖傑、睿婕、佳昕、淑惠、凱博、芷瑄、宣瑄、于萍、妤蓁、適瑄、心盈、健雄哥、姿羽、伊思、阿鯨、Ricky 教練、侯哥、鉛姊，諸位皆曾於我低迷時期給予我莫大支持，大恩不言謝，盼今後可持續共同奮鬥，探索人生道路並肩前行；可崴、昱彬、斯、明哲、七七，記得那陣子總樂於陪我打遊戲，每當我一聲「手好癢！好想打遊戲喔！」，大家便各就各位，在《RAFT》當中各司其職，蓋船的蓋船，煮飯的煮飯，打獵的打獵，撿垃圾的撿垃圾，跳海的跳海，餓死的餓死（？），還有《Don't Starve Together》之類的遊戲，甚至還會一起玩 larp，好懷念喔。

老爸、老媽，你們一個既嚴厲又敏感，另一個彈性到沒有邊界，一路走來雖磕磕絆絆，卻至少是讓我和奕杰在充滿幸福與希望的環境中成長，現實生活中很少向你們表達愛與感激（畢竟聚在一起的時候也都在幹話 XD），但希望你們知道，我很開心能成為你們的孩子，謝謝你們給了我無限的自由與成長空間，謝謝你們從不對我有過苛的限制，謝謝你們不斷告訴我，即使無法功成名就，但求品行要夠格，要善良、要真誠、要以禮待人，足矣；老弟奕杰，總在我看不見的地方默默給我支持與鼓勵，如此內斂但纖細，是縱使再多好友也無法比擬的關愛，我都有收到，也都有記牢，謝謝你的體貼，也謝謝

你常在我面前耍寶（？）；外婆、大舅、小舅、爺爺、奶奶，亦總是給我諸多支持，且以各種方式（例如買各種吃的喝的 XD）激勵我，真的非常感謝。

家人系列走到最後，要來感謝三位沒有血緣的家人。其中兩位，妍惠、又仁，常陪我和妍智一起玩耍，而這段有趣的日子也陪著我走過了碩班生涯，期待未來的探險，也希望妍惠指揮官可以偶爾休息一下，不要總是拿著平底鍋揍人，平底鍋說它會痛。

最後且最重要的一位，妍智，無懈可擊的好戰友，推心置腹應當無須多言，謝謝你始終相伴，也在此先謝過你未來好幾十年的相伴。

至於自身，盼能內化文首所述，引以為鑑，成為一個勇於突破體制、不受框架所拘束的個體。

2026.05.27 琤

於臺北大學圖書館三樓

參考資料：

BearBone Studio（2024）。沉沒意志。Steam。

NTPU

# 國立臺北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

## 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被害者也有預設值？——散佈性影像中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研究

Default Settings for Victims? — A Study on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in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本論文係 林郁琤 於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完成之碩(博)士學位論文，於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5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合格，特此證明

論文考試委員簽名：

委員(召集人) 

委員(指導教授) 

委員(指導教授) 

委員 

系（所）主任簽名：

NTPU

**國立臺北大學一百一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學位論文提要**

論文題目：被害者也有預設值？——散佈性影像中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研究
論文頁數：74 頁
所組別：犯罪學研究所　　（學號：711364102）
研究生：林郁琤　　指導教授：沈伯洋、周愫嫻

# 論文提要內容：

本研究主要探討於近期盛行之「散佈性影像行為」下，「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此三大焦點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影響，以及「公正世界信念」於其中所產生的效果。過去研究顯示，現有的性別基模會促使社會大眾將事件之被害者預設為女性，將加害者預設為男性，且僅有無辜脆弱的理想被害者始能受到社會信任；然若被害者之背景不符合前述社會大眾所預設之條件，便會受到責備與質疑，進一步影響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尤其公正世界信念程度愈高之個體，對被害者之譴責程度愈高。另，隨著科技進展已漸趨發展出許多新型犯罪態樣，而數位環境的便利亦使得這些犯罪更易於完成，尤以「散佈性影像」最為嚴重，每一百人當中就有八人曾經被害。因此，本研究假設，當散佈性影像事件之被害者為無加害經驗之女性，且加害者為男性時，該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最高；而公正世界信念程度愈高之受試者，愈傾向於認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低。

本研究之實驗為 2（被害者之生理性別：男 / 女）×2（加害者之生理性別：男 / 女）×2（被害者之身分類型：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 / 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之三因子完全受試者間設計，以八種散佈性影像事件之情境來探討三大變項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影響，並使用全球公正世界信念量表（Glob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GBJWS）來測量受試者之公正世界信念程度，進一步分析公正世界信念於其中的影響。而研究結果顯示，僅「被害者之生理性別」為一較關鍵之影響因素，且當被害者為女性時，其陳述可信度較高；至於公正世界信念則無顯著影響。

關鍵字：被害者陳述可信度、理想被害者、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散佈性影像、公正世界信念

# ABSTRACT

Default Settings for Victims? — A Study on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in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By

LIN, YU-CHENG

May 2026

ADVISOR: Dr. SHEN, PO-YANG & Dr. JOU, SU-SYAN
DEPARTMENT: GRADUATE SCHOOL OF CRIMINOLOGY
MAJOR: CRIMINOLOGY AND CRIMINAL JUSTICE
DEGREE: MASTER OF ARTS

This study primari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ree key factors on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cently prevalent phenomenon of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IBSA): the biological sex of the victim, the biological sex of the perpetrator, and the victim's prior experience as a perpetrator. Additionally, the study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ithin this framework. Prio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existing gender schemas lead the general public to default to perceiving victims as female and perpetrators as male, and that only innocent and vulnerable ideal victims are afforded social credibility. However, when a victim's background does not conform to these socially presumed conditions, they are subject to blame and skepticism, which further undermines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This effect is particularly pronounced among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levels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ho tend to attribute greater blame to victims. Furthermore, as technology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numerous new forms of crime have emerged, and the convenience of digital environments has made these crimes increasingly easy to commit. Among these,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is the most serious, with as many as eight out of every one hundred individuals having been victimized. Accordingly, this study hypothesizes that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will be highest when the victim of an IBSA incident is a female with no prior history as a perpetrator and the perpetrator is male; furthermore, participants with higher levels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re expected to perceive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as lower.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of this study employed a 2 (biological sex of the victim: male / female) × 2 (biological sex of the perpetrator: male / female) × 2 (victim identity type: victim

with no prior perpetration experience / victim with prior perpetration experience) fully between-subjects factorial design, utilizing eight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IBSA) scenario condition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he three variables on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The Glob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GBJWS) was administered to measure participants' levels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nabling further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e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only the biological sex of the victim emerged as a relatively critical influencing factor, with female victims being associated with higher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however, yielded no significant effect.

**Keywords:** *the 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 *The Ideal Victim*, *Victim-Offender Overlap*,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NTPU

NTPU

# 目錄

**目錄** ..... **I**

**表目錄** ..... **III**

**圖目錄** ..... **I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3

第三節　名詞解釋 .....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5**

第一節　大眾眼中的「理想被害者」 ..... 5

第二節　心中那把名為「公正世界信念」的尺 ..... 8

第三節　跳脫二元對立的「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 ..... 11

第四節　影響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因素 ..... 14

第五節　散佈性影像行為之特殊性 ..... 17

**第三章　研究設計** ..... **20**

第一節　研究架構 ..... 20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程序 ..... 22

第三節　研究工具 ..... 2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 **33**

第一節　描述統計分析 ..... 33

第二節　主要研究發現 ..... 3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42**

第一節　研究摘述 ..... 42

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論 ..... 44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48
**參考文獻.....51**
一、外文部分.....51
二、中文部分.....62
三、其他資料.....62
**附錄一　問卷（以情境五為例）.....63**
**附錄二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14 年度訴字第 229 號判決（摘錄）.....74**

NTPU

# 表目錄

表 3-4-1 操弄檢核題.....30
表 3-4-2 各情境之操弄檢核題選項.....31
表 3-4-3 全球公正世界信念量表.....32
表 4-1-1 人口學變項之次數分配表.....34
表 4-1-2 三大主要研究變項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描述性統計（$N = 350$）.....36
表 4-1-3 公正世界信念之描述性統計.....36
表 4-1-4 各變項間之相關（$N = 350$）.....38
表 4-2-1 三大主要變項於「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上之 *ANOVA*.....40
表 4-2-2 三大主要變項與「公正世界信念」之交互作用分析.....41

NTPU

# 圖目錄

圖 3-1-1 研究架構.....20

NTPU

# 第一章　緒論

*要是真相帶來不便，要是真相不合理，人們就不會相信。*

*"If the truth is inconvenient, and if the truth doesn't fit, they don't believe it."*

*（《Unbelievable》Episode 7）*

*—— 劇中主角 Marie Adler*

此為《Unbelievable》（中譯：《難，置信》）影集中，主角 Marie 在經歷一連串事件與輾轉後，所吐露出的真實感受。劇中，Marie 向警方陳述其受性侵害之經歷時，其被害之反應並不符合人們心中所「預設」的、身為被害者該有的情緒狀態，且被害過程具有過多疑點，使警方產生懷疑；而在警方深入瞭解 Marie 的背景後，得知 Marie 之不良性格並且曾有諸多怪異行為舉止，因此，警方直接一口咬定 Marie 謊報案件，絲毫不相信 Marie 的被害陳述。而諷刺地是，影視作品僅僅是社會的縮影，僅僅是社會的一隅。

將視角拉回現實世界，隨著 #MeToo 與 #WhyIDidntReport 等標籤運動於社群上發起，許多曾為黑數而不為人知的受害經歷逐漸被社會看見，甚亦連帶促使更多人願意揭露自身經驗以及想法；然與此同時，卻有部分聲音正對這些被害者進行質疑。有些謾罵言論涵蓋了傳統性別刻板印象的遺毒，甚而上升到性別歧視與人身攻擊；有些則聚焦於被害者先前曾有的加害經歷，認為此類「曾犯過錯的人」不配得到同理與關注，進而抹滅其現有之受害遭遇。然而，是否真如前所言，被害者須「完全乾淨、未曾犯過錯」才足以獲得重視？且於現今科技進展而隨之盛起的數位性犯罪，使加害與被害之界線更加模糊，於此情形下，大眾又以何種標準來確立所謂的「被害者」？

「被害者」之概念愈發成為一種神聖化的主體，亦逐漸演變為人們「想像中的被害者」，甚或社會大眾心中已默默對被害者之形象設下「預設值」；然而，如此轉變，將使得公眾只願意關注特定被害者的故事，從而忽略了其餘不符想像的被害者，甚或導致更深層次的問題。

為呼籲社會大眾對被害者平等重視、為瞭解前述現象所發生之原因與脈絡，本研究將針對「陳述可信度較高之被害者」之形象進一步揭示，盼能於瞭解各種形塑理想被害者之因素後，剖析其中緣由，並探究整體社會現象之演變。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因散佈性影像之犯罪型態愈發多樣，因而致使被害者受責備與質疑的聲音漸廣（Mclocklin et al., 2024；Powell & Henry, 2017；Sparks et al., 2023）。關於被害者受責備一事，最早於 1986 年便有學者提出「理想被害者」之概念，用以形容社會大眾心中理想的被害者樣貌與條件，換言之，倘若某位被害者不符合人們心中對理想被害者「預設值」，則該位被害者便會受到譴責、謾罵，甚或不信任（Christie, 1986；Mankowski & Maton, 2010；Schwöbel-Patel, 2018）。

除了前述 Christie 所提出的理想被害者之概念外，性別刻板印象對被害者的形象亦影響甚遠，且與加害者及被害者之性別皆有關聯（Rechenberg & Schomerus, 2023；Weiss, 2010）；尤以敵意性別歧視（Hostile Sexism）影響更甚（Cherniawsky & Morrison, 2022）。而歸因方式亦與此概念有關，且甚至會針對不同性別進而產生不同結果（Sleath & Bull, 2010）。

另亦有多數研究發現，公正世界信念（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會深化社會對被害者的責備（Grubb & Harrower, 2008；Hafer et al., 2019；Li & Zheng, 2025）。並且，前述之敵意性別歧視亦會顯露於此一概念當中（Sakallı-Uğurlu et al., 2007；Valor-Segura et al., 2014）。也有研究表明，被害者的過往具爭議性之行為會與人們之公正世界信念產生交互影響（Landström et al., 2016）。

而諸多研究發現，「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Victim-Offender Overlap, VOO）」確實出現於眾多犯罪類型當中（Chan, 2020；Lee & Shen, 2018；周愫嫻，2014）；然而，此一現象卻總被社會所忽視（Godsoe, 2022）。於此身分重疊現象中，針對「具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之研究較為少數（Karasavva & Forth, 2022；Taylor et al., 2007）。

而論及被害者受責備之現象，便須針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加以討論。過往研究指出，有許多因素皆會影響被害者陳述可信度，包含年齡、揭露時點等，甚或受試者本身之性別亦會有所影響（Dauphinais, 2021；Edelstein et al., 2006；Pozzulo et al., 2010）。並且，性別刻板印象與被害者之過往犯罪史（Criminal History）亦是影響被害者陳述可信度的重要因子（Beichner & Spohn, 2012；Campbell et al., 2015；Machado et al., 2016）。

綜整上述關聯，再回頭聚焦於較新型態之散佈性影像行為。於此犯罪類型當中，除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屬顯而易見之外，前述身分重疊現象亦屬常態（Clancy et al., 2019；McGlynn & Johnson, 2021；Sparks et al., 2023）。

基此，本研究將以「散佈性影像行為」作為主要研究之犯罪類型，探討「被害者之性別」、「加害者之性別」與「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此三大焦點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影響，並進一步分析「公正世界信念」於其中之調節效果。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聚焦於「散佈性影像行為」，並有下列四個研究目的：

a. 探討「被害者之加害經驗」與「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的關聯。
b. 探討「當事人之生理性別」與「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的關聯。
c. 分析「過去加害經驗」、「當事人之生理性別」與「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三者間的關聯。
d. 分析「公正世界信念」於上述關聯中之影響。

## 第三節　名詞解釋

壹、散佈性影像行為

依臺灣現行之《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8 項[1]所示，凡任何關於性交行為、性器或身體隱私部位，且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影像或電磁紀錄，皆屬性影像；又於《中華民國刑法》第 319 條之 3 第 1 項[2]中規範未經同意散佈性影像之數位性別犯罪。

基此，本研究所欲探討之「散佈性影像」，即屬前述《中華民國刑法》第 319 條之 3 第 1 項之犯罪。

貳、具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

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具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即屬「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Victim-Offender Overlap, VOO）」下之一環，此將於文獻探討部分詳細討論之。

而本研究所採之他案「過去加害經驗」之定義，亦包含《民法》中之侵權行為，並不限於《中華民國刑法》中之犯罪行為。

---

[1] 稱性影像者，謂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

一、第五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行為。

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

三、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位，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2]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其性影像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第一節　大眾眼中的「理想被害者」

### 壹、理想被害者之起源與概述

理想被害者（The Ideal Victim）之概念最早於 1986 年由挪威犯罪學家 Nils Christie 所提出，即部分被害者因具備某些特質，從而較易被賦予「完整」的被害者身分，亦較受到社會大眾相信；換言之，社會對於「被害者」常存有某種既定印象( Christie, 1986 )。並且，於國際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入口大廳，商務中心一隅的多媒體展覽處設置了一段音檔，此為一虛構的被害者正講述其曾經歷的故事；然而，此音檔卻將該位虛構被害者設定為「女性」，甚至刻意強調其「脆弱」之形象，不禁引發他人對兩者產生連結（Schwöbel-Patel, 2018）。

亦有許多研究顯示，社會大眾傾向將遭受性侵害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事件被害者本身（Janoff-Bulman et al., 1985；Jenkins & Dambrot, 1987；Muehlenhard et al., 1985）；尤其女性遭受歸咎的程度更大，並且歸咎的面向包含其本身之性格、衣著暴露程度，以及身體吸引力等（Abbey et al., 1987；Edmonds & Cahoon, 1986；McCaul et al., 1990）。而無論於何種犯罪下，被害者不僅須承受該事件所帶來的直接身體與情感上傷害，與此同時，亦會遭受到來自他人的負面評價甚或不理解等反應（Janoff-Bulman & Frieze, 1983；Lerner, 1970）。

Schwöbel-Patel（2018）指出，國際刑事法（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中的論述與用語，將被害者形塑為女性化、幼體化與種族化之態樣，而此種特定且偏頗的被害者形象，正是公眾刻板印象的展現。並且，此種形象的建構，亦是濫觴於注意力經濟；意即，引人注目甚或是極端化的事物更易獲得關注，也因此而伴隨「理想被害者」此一概念的產生（Schwöbel-Patel, 2018；Wu, 2016）。

另，關於理想被害者的特質亦有許多說法。較早的研究觀點認為，理想被害者必須是虛弱的（如女性、年邁等）、無辜的，且正在從事正當活動（如照顧家

人等），並且不認識加害者，甚至常被描述為「白人女性」（Christie, 1986）；至於近期研究則認為，理想被害者必須是非故意讓自己處於危險之中，且是被動的、需要依賴他人的，甚至必須具有極端且誇張的受傷形象，藉此引發他人同情（Schwöbel-Patel, 2018）。

另亦有研究顯示，黑人常因其膚色、階級或移民身分，導致無法受到警察重視，甚而反將其視為嫌疑人對待之；在此情形下，黑人因知悉自己不符理想被害者之形象，故在被害情境下常優先選擇以其他方式處理自身處境，而非求助於執法部門（Long, 2021）。

綜整前述文獻可知，性別與種族常與「理想被害者」產生連結，而其中，又尤以「女性」族群更為明顯。因此，將繼續針對性別刻板印象進行深入討論，一探其究竟如何影響「理想被害者」此一概念。

## 貳、性別刻板印象下的理想被害者

關於前述理想被害者的建構，傳統性別刻板印象亦佔有一席之地。除認為女性屬柔弱形象之外，相對地，此種刻板印象亦期待男性是強壯的、陽剛的，故男性並不符合理想被害者中的「脆弱」特質，進而將男性的被害者困境最小化（Depraetere et al., 2021；Ralston, 2020；Sleath & Bull, 2010）。

而自此衍生出的男性強暴迷思（Male Rape Myths）亦展現出強大的性別期望，意即，社會認為「男性不可能被強暴」，故男性被害者常因害怕被貼上「軟弱」或「不夠男人」的標籤而選擇沉默不發聲，甚或不願尋求協助（Ralston, 2020；Sleath & Bull, 2010；Walfield, 2021；Weiss, 2010）。

然而，於性別刻板印象當中最為嚴重的現象，便是所謂的「敵意性別歧視（Hostile Sexism）」。人們會公然地貶低女性，並認為女性會嘗試透過欺騙或性方面的操縱來奪取男性權力，而此種觀念即是父權文化下的產物，因此，當女性被害時，人們常會認為這些女性是罪有應得的，並對這些被害者施以更多的責備與謾罵（Cherniawsky & Morrison, 2022；Glick & Fiske, 2001）。

從他者視角觀之，男性被害者常會受到行為歸因（Behavioral Blame），即被社會大眾責怪為何欠缺充足的警覺意識、為何在事件當下未立即採取防衛措施等；而女性則常受到性格歸因（Characterological Blame），即歸咎於其本身性格或特質等，認為女性被害皆係因其本身個性所致（Sleath & Bull, 2010）。

另，在集體主義社會中，常強調個體是群體的一部分，必須尊重群體之價值觀，因此，女性常受傳統性別角色期待所束縛，必須嚴格服從群體需求及男性家長的安排（Davis & Williamson, 2019；Triandis, 2001）。基此，於高度集體主義或低度個人主義之社會文化下，信任的建立與社會互動大多是由父權家長進行，而女性多是扮演從屬或被動角色（Dutta et al., 2022）。

然而，此種父權思想雖賦予男性諸多經濟與社會上的特權，卻也促使男性在性暴力被害情境下遭到反噬，意即，男性族群便常被認為是「理想加害者」（Christie, 1986；Mankowski & Maton, 2010）。相關研究諸如：傳統觀念中存有性腳本（Sexual Scripts）之概念，即將男性預設為性行為的發起者，因此，當男性成為性暴力的被害者時，便不符前述性腳本所預設之流程，將會導致其整體男子氣概受到質疑，從而致使男性被害者更不願承認自己的被害經歷（Weiss, 2010）。再例如：Rechenberg 與 Schomerus（2023）的研究結果指出，社會刻板印象通常將「男性」與支配、力量及抵抗等特質產生連結，這些更是代表著「施暴者屬性（Perpetrator-Typical Attributions）」。

綜上，於性別刻板印象當中，男性常被認為是強大的、獨立的、堅忍的，亦更容易被視為施暴者；而女性則被認為是脆弱的、具依賴性的，便較不易與施暴者之概念產生關聯（Seelau et al., 2003；Vogel et al., 2011）。並且，男性加害者對於女性被害者的施暴行為，相較於其他性別組合，會受到更嚴厲的譴責（Arias & Johnson, 1989；Ahmed et al., 2013；Felson & Feld, 2009）。

綜整所有文獻後可知，理想被害者之概念與「性別」存有極大關聯，並且也從中進一步得知，被害者於大眾眼中常會存在「預設值」，意即，社會大眾常將被害者之性別預設為「女性」；相對地，亦會將加害者之性別預設為「男性」。

## 第二節　心中那把名為「公正世界信念」的尺

除前一節提及的性別刻板印象之外，眾多研究亦指出公正世界信念會加劇社會大眾對被害者的譴責與質疑。以下將對其進行介紹，並進一步闡述公正世界信念與理想被害者之關聯。

### 壹、符合二元對立框架的「公正世界信念」

Lerner（1980）提出的公正世界信念（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認為，人們會將他人評價為「好人」與「壞人」兩種，好的人會獲得理想的命運，而壞的人將面對其應有的懲罰，換言之，會受到懲罰或會成為被害者的人，皆屬壞人。

而這樣的信念濫觴於個體對自身控制感的滿足或需求，意即，人們傾向於相信「這世界是公平且正義的」；並且，為了維持這樣的信念，當某事件突破了此一守則之時，便會使個體發生認知失調，也就是說，當一位無辜的被害者出現時，人們會發現自己所秉持之公正世界信念與現實不符，而為了維持自身所相信的世界規則，人們會對被害者產生負面評價，甚至直接將責任歸咎於被害者本身，藉此平衡個體心中的公正世界信念（Dalbert, 1999；Grubb & Harrower, 2008；Hafer et al., 2019；Lerner, 1980；Li & Zheng, 2025）。

並且研究指出，具備高度公正世界信念者會將社會當中的不平等進一步合理化，認為社會階級較低之族群甚或暴力行為之被害者不需要獲得幫助，因為這正是世界上公平正義的展現（Jost & Banaji, 1994；Oldmeadow & Fiske, 2007）。尤其於家暴事件當中，此一責備加害者之現象更是不在少數（Schuller et al., 1994；Sakallı-Uğurlu et al., 2007）。

Maes（1994）再將公正世界信念進一步區分為「內在正義（Immanent Justice）」與「終極正義（Ultimate Justice）」兩大面向：內在正義係指當下所發生的不幸皆是來自過往的罪惡，將重點放在過往；而終極正義則是指當下所發生的不幸最終皆能獲得補償，將重點放在未來。並且，有研究顯示公正世界信念與內在控制信

念（Belief in Internal Control）間具備顯著正相關（Rubin & Peplau, 1973）。由此可知，公正世界信念或許並非單一的同質性概念。

## 貳、「公正世界信念」視角中的「性別」

如同前一節所提及的「敵意性別歧視」，眾多研究已有針對此一歧視現象與公正世界信念兩者進行分析，然而研究結果不盡相同。較多研究認為兩者間呈正相關，即具備高度公正世界信念的人傾向於認同傳統性別觀念，進而會對偏離規範的女性產生負面評價（Sakallı-Uğurlu et al., 2007；Valor-Segura et al., 2014）；另有認為，兩者間並不存在顯著關聯性（Correia et al., 2015）。

有趣的是，一項針對中國的研究顯示，於集體主義與父權主義的中國文化之下，證實了整體而言，具備高度公正世界信念者較傾向於責備被害者；然而，於敵意性別歧視方面則有特別的發現：公正世界信念較弱的男性，反而會因自認「男性本就有權壓制或掌控女性」，從而對女性表現出更高的敵意，甚或公然對女性進行批評與責備（Li & Zheng, 2025）。

綜前所述，並結合第一節的討論後可推知，「性別」與「公正世界信念」兩者間可能存有交互作用，進而共同影響社會大眾對被害者的評價與信任。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此議題進行探討，分析此議題於臺灣是否如同多數研究所得之結果？或因基於東方文化脈絡從而產生與中國研究相同之現象？

## 參、「公正世界信念」與「理想被害者」是互斥抑或互補？

最後，必須回歸「公正世界信念」與「理想被害者」兩大概念的本質進行思索。於第一節關於理想被害者的討論中可知，當被害者愈是符合社會大眾心中的樣貌，即無辜、脆弱等，則該被害者始能獲得較正面的評價以及較高程度的信任；然而，經由本節關於公正世界信念的討論後，雖前述眾多研究皆表明公正世界信念愈強者愈傾向責備被害者，但此時，當中的矛盾點亦悄然浮現。

Pemberton（2012）於研究中提到，當今被害者學在闡述理想被害者概念的同時，其實忽略了公正世界信念所帶來的防衛機轉；換言之，大眾心中之理想被害者形象必須是絕對無辜的且無其他有爭議性之行為，然而，實際上人們卻會因公正世界信念而不願相信無辜被害者的存在，進而給予被害者更多的責備與批判，兩相結合之下，導致現實中根本不存在所謂的「理想被害者」。

縱使兩概念間具備矛盾之處，但整體而言或許並非全然地互斥。Landström等人（2016）針對 200 位受試者進行研究，而研究結果除再度證實了「公正世界信念」與「責備被害者之程度」兩者呈高度正相關之外，另也得出一項結論：相較於對加害者進行挑逗行為的性犯罪被害者，無挑逗行為者受責備的程度最低。此一結論並不同於前述「無辜被害者會受較多責備」之論述，由此可知，「公正世界信念」與「理想被害者」兩者並非全然不同，甚或當中可能存在著交互作用。

而依循 Landström 等人（2016）的研究結果可推知，若將研究中僅是「有些許爭議性的挑逗行為」，進一步改為「確實有發生損害的加害行為」，如此一來，公正世界信念是否仍會影響被害者受責備的程度？基此，本研究亦將探討「被害者的先前加害經驗」與「公正世界信念」兩者間的交互作用效果，並於下一節深入介紹「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

## 第三節　跳脫二元對立的「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

循著前二節所提到的「無辜被害者」之概念，然若此被害者具有過往之加害經驗，是否亦會使該被害者獲致更多責備？以下將先針對「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進行概述，再進一步聚焦於本研究所關注之「具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

### 壹、實為常態卻總被忽視的「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

本研究所關注的「具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即屬「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Victim-Offender Overlap, VOO）」下之其中一種類型，亦屬前二節所討論的非理想被害者族群。多數研究已證明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確實存在顯著的重疊現象，他們往往具有相似的特徵與行為模式，換言之，犯罪的人有較大可能成為其他犯罪的受害者；更有研究指出，加害者與被害者通常會是同一群人（Broidy et al., 2006；Gottfredson, 1981；Schreck et al., 2002）。並且，多種犯罪類型皆存在此一現象。

岡安孝弘與高山巖（2000）針對日本的中學生進行研究，發現其調查的校園霸凌被害群體當中，某些人同時也是其他事件之加害者；而加害群體當中亦有某些人同時是其他事件之被害者。此種身分立場不斷轉換的現象，於校園霸凌中實屬常見。且學者亦指出，政府與媒體常因出於恐懼，而將校園霸凌中的加害者與被害者進行兩極化分類，藉此來懲罰所謂的「加害者」，與此同時卻也忽略了霸凌的真實面貌，導致社會大眾愈發無法認知到「加害者與被害者僅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形象」；實際上，加害者與被害者身分常會同時出現在同一位學生身上，而背後扭曲的校園結構與文化才是致使霸凌現象發生的關鍵（Lee & Shen, 2018）。

另，此一身分重疊現象亦會發生於網路偏差行為。一項針對青少年網路行為的研究顯示，青少年常會使用虛擬身分進行網路活動，且於這群青少年當中，亦有多數皆曾同時具有加害經驗與被害經驗，並會因此而採取擬態之方式活躍於網路上，藉此來保護自己不會被害，更能同時便於主動出擊並發動加害行為（周愫嫻，2014）。

再論及其他犯罪類型，於性犯罪當中亦常出現此一現象。根據 Chan（2020）的研究顯示，在香港年輕成人樣本當中，有 4.6%的參與者同時具有性犯罪的加害經驗與被害經驗；而 Jennings 等人（2010）以軌跡方法學（Trajectory Methodology）進行研究，於其研究樣本中，犯罪行為軌跡之群體與被害行為軌跡之群體間存有顯著關聯，且所有高頻率被害者群體[3]亦同時是中頻率犯罪者群體[4]，具高度正相關。上述二研究皆表示，加害與被害間具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情形。

儘管「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確實存在，且在性犯罪與暴力犯罪當中尤為明顯，然而，傳統犯罪學研究卻常認為加害者與被害者係兩個獨立的群體，刑事法律與執法部門亦仍將二者視作對立甚或互斥，並進行僵化且帶有道德色彩的二元化分類（Godsoe, 2022；Hindelang et al., 1978）。

貳、重疊之中亦有跡可循：「曾被害之加害者」與「曾加害之被害者」

而觀諸眾多研究，除針對全體身分重疊者進一步研究外，亦可細分為「具有過去被害經驗之加害者」與「具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二類進行討論。

較多研究針對「具有過去被害經驗之加害者」進行探討。例如：Drury 等人（2019）針對正接受矯治之受刑人進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在同時控制了多種犯罪學與精神病理學的混淆變數（例如：犯罪史、反社會人格、性偏好等）之後，童年時期性虐待（Childhood Sexual Abuse, CSA）與其後續所犯下的性侵害犯罪具有顯著的正相關，由此可知，個體過往的被害經驗確實與其後續之加害經驗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並且，該研究亦發現，首次遭受性虐待的年齡愈小，未來因性犯罪被捕的可能性也就愈高。

再例如：Elliott 等人（1995）針對 91 名已被定罪的兒童性侵害犯罪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而研究發現，其中有高達 59%的加害者曾於童年時期遭受過性侵害；Ogloff 等人（2012）長達四十五年的追蹤研究顯示，遭受童年時期性虐待之

[3] 該群體於 12 歲時平均有四次被害事件，但於 16 歲時急劇增加至超過三十次被害事件。

[4] 該群體自平均兩次的犯罪行為開始，於 14 歲時達到約三次的峰值，並於 16 歲時下降。

被害者被指控任何類型之犯罪的可能性顯著高於一般人（*OR* = 4.97），而若僅針對性犯罪，其所增加之可能性更為顯著（*OR* = 7.59）。

至於「具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之類型，則較少研究深入討論。相關研究包括：Taylor 等人（2007）一項針對青少年幫派的研究顯示，幫派少年的犯罪行為本身也會獲致他人的報復，而導致該少年後續亦成為暴力犯罪的被害者；Karasavva 與 Forth（2022）針對 816 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在影像性虐待（Image-Based Sexual Abuse, IBSA）的被害者當中，有 28%的人同時具有加害經驗。

即便較少研究係針對「具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此一族群進行分析，卻也同時為「是否會獲得較多負面評價」一事帶來更強烈的不確定性。綜整目前共三節的討論，本研究於此已集齊三大焦點，即「被害者之性別」、「加害者之性別」，以及「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再結合「公正世界信念」，盼能一窺其共同交織出的火花。而後續將扣緊社會大眾給予被害者的信任與責備進行討論，並藉此帶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之主要概念。

NTPU

## 第四節　影響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因素

藉前三節的討論可知，「被害者之性別」、「加害者之性別」與「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此三大焦點皆可能會影響本案被害者受責備之程度，亦可能會影響本案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基此，以下將先綜覽會使被害者陳述可信度受影響之各種因素，再進一步探究前述三大焦點與「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關聯。

### 壹、相信「被害者的陳述」抑或是相信「被害者的背景」？

關於影響被害者陳述可信度（Credibility of Victim Testimony）之因素，許多研究皆對此有所探討。於年齡方面，成年被害者之陳述會比兒童被害者獲得更多的信任（Edelstein et al., 2006）；而於揭露時點方面，延遲時間較短的揭露被認為較可信，舉例來說，相較於延遲了二十年的揭露陳述，僅延遲不到一年的陳述會較被相信（Golding et al., 1995；Sugarman & Boney-McCoy, 1997）。且亦有研究指出，被害者之年齡與延遲程度間會交互影響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因大眾普遍認為孩童遭虐待時會立刻報案，故當被害孩童之揭露時點過晚，其陳述之可信度則會較低（Pozzulo et al., 2010）。

另有一較為特別的發現是，觀察者本身的性別亦會影響其對被害者陳述的相信程度。有研究顯示，比起男性，女性觀察者更傾向於相信被害者的陳述（Edelstein et al., 2006）；相對地，亦有研究指出，當男性受試者觀察男性對女性施以暴力之情境時，會對該位男性加害者產生知覺相似度（Perceived Similarity）與同理心，進而對女性被害者感到不信任甚或加以譴責（Dauphinais, 2021）；另，有研究結合社會認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之概念，發現個體較傾向於相信與自己具有相同性別之被害者的陳述內容（Droogendyk & Wright, 2014；Dickinson & Roberts, 2025）。

再論及法庭情境，Pennington 與 Hastie（1991）訪談了二十六位模擬陪審員，發現陪審員會受到故事的連貫性影響，若被害者陳述當中的因果關係混亂，其可信度便會降低；而被害者的人品與性格亦會融入上述的故事結構當中，藉此分析

整體故事的內部一致性、合理性與完整性。另，於兒童性侵害案件中，具備更多該議題相關知識的陪審員較傾向於相信被害者的陳述（Goodman-Delahunty et al., 2021）；意即，人們本身對於案件類型之議題的知識程度亦會影響其對被害者陳述的信任程度。

而於臺灣，有研究針對性侵害案件之檢察書類進行分析，在統整了 2008 年至 2020 年之檢察機關起訴與不起訴書類後發現，於少部分不起訴書類中，檢察官確實會以「被害者未積極呼救」或「案發之後仍會與加害者互動」等出自個人直覺的用詞來檢視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然研究者亦提及，近年來的法院判決已逐漸能覺察社會對「理想被害者」之刻板印象，並對此類法院判決給予肯定（蔡宜家等人，2021）。

## 貳、當「被害者的陳述」遇上「性別」與「過去加害經驗」

然若聚焦於案件當事人之性別與被害者之過去經驗等因素，卻僅有少數研究對此進行分析。Depraetere 等人（2020）的研究指出，現有的性別基模（Gender Schemas）將男性視為加害者，而將女性視為被害者，導致男性被害者大多會遭受質疑，對其信任度亦會較低。由此可知，男性被害者之所謂「被害者」身分，其可信度並不如女性被害者（Drijber et al., 2013；Machado et al., 2016）。另有研究顯示，於傳統觀念中對於性別角色的態度，包含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等，皆是影響被害者陳述可信度的重要因素（Herzog & Oreg, 2008）；且社會對被害者的情緒反應亦會有所期望，期望女性被害者會表現出較多的恐懼與悲傷、期望男性被害者有較多的憤怒情緒，而此種期望亦會影響該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Fabes & Martin, 1991；Plant et al., 2000）。

然於加害者方面，研究指出，當加害者為男性時，反而會使被害者之可信度有所提升（Bornstein et al., 2007；O'Donohue et al., 1998；Rogers & Davies, 2007）；且於此情形下，被害者之感受與陳述方面，亦會被認為是較準確的、較真實的（Voogt et al., 2020）。

而於被害者先前之加害經歷方面，Beichner 與 Spohn（2012）的研究確實指出，被害者本身的過往犯罪史（Criminal History）會降低其言論與證詞之可信度，即具有犯罪經歷之被害者較不被相信。Campbell 等人（2015）的研究亦顯示，被害者先前遭逮捕的記錄與過往之所有罪行，皆會導致該被害者的人格遭賦予負面評價，並進一步影響其陳述之可信度。

綜上所述，即便關於此議題之研究較為缺乏，然而，這些研究卻一致指向一種結論，即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確實會受到其先前加害行為或當事人性別所影響；並且依前述文獻可得出以下論點：

a. 當被害者為女性時，其陳述之可信度可能較高。

b. 當加害者為男性時，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可能較高。

c. 當被害者具過去加害經驗時，其陳述之可信度可能較低。

文獻綜整至此，關於「被害者之性別」、「加害者之性別」與「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此三大焦點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影響，已可統整出前述三大論點。基此，本研究除針對此三大論點進行分析外，亦會探討其中之交互作用存在與否，並進而探究「公正世界信念」於其中之效果。而接續之最後一節文獻回顧，將針對本研究所選定之犯罪類型，即數位性別犯罪中之「散佈性影像行為」，進行更進一步的討論。

## 第五節　散佈性影像行為之特殊性

經前四節之探討，已可推知「被害者之性別」、「加害者之性別」與「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可能會對「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產生影響，並且「公正世界信念」亦可能於其中發生調節效果；然犯罪類型百百種，又為何本研究選定「散佈性影像」之行為進行分析？以下將先概述散佈性影像行為之各式類型，後再聚焦描述散佈性影像行為與前述之本研究三大焦點間之關聯。

### 壹、一指輕點即完成的犯罪——散佈性影像行為

隨科技愈發進步，犯罪態樣亦會隨之改變。而數位社群網站具虛擬或匿名特性，使諸多不懷好意者更易透過此類網站進行騷擾、網路霸凌，甚或散佈色情訊息與影像等，其中又尤以女性面臨較巨大之風險（Hayes & Unwin, 2016；Kloess et al., 2014；Marganski & Fauth, 2013）。當社群網站漸趨普及，網路色情資訊之形態亦愈發多樣，相較於傳統形式亦更易被取得，且使用者具備高度匿名性、高度互動性與高度隱私性，讓網路成為了交友、談戀愛，甚或是尋找性行為對象的首要選擇（陳婷玉，2008）。

基此，性簡訊（Sexting）便成為年輕世代族群常見的表達形式，即透過社群網站抑或是手機簡訊等方式傳送帶有性暗示的訊息（Mori et al., 2020）。此種性簡訊之方式，實與許多有益且良好之動機有關，諸如調情、表達信任，甚至能夠做為維持遠距離戀愛之親密關係的方式（Burkett, 2015；Bonilla et al., 2021）。

然而，反面觀之，性簡訊亦漸趨發展為一種現今極其常見的犯罪手段。於科技助長的性暴力（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TFSV）當中，較常見之犯罪類型為影像性虐待（Image-Based Sexual Abuse, IBSA），即所謂散佈性影像之行為，而其中又有不同的分類：依 Powell 與 Henry（2017）的研究資料，並採廖美蓮（2020）之名詞翻譯與整理，大致可分為純粹為報復過往戀人而散佈其性私密影像的「關係報復（Relationship Retribution）」、為威脅被害者從事某些行為而散佈其性私密影像的「性勒索（Sextortion）」、純欲於網路上分享而散佈其性私

密影像的「性偷窺（Sexual Voyeurism）」、以販賣其性私密影像與交易金錢為主的「性剝削（Sexploitation）」，以及藉威脅欲散佈影像而要求被害者與自己發生性行為的「性侵害影像（Sexual Assault Imagery）」共五種類型；另，Sparks 等人（2023）則將其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被害者因受到威脅或壓力而自願散佈其性私密影像的「強迫性簡訊（Coerced Sexting）」、意圖羞辱或貶低被害者而未經其同意即分享其性私密影像的「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Non-Consensual Dissemination of Intimate Images, NCII）」，以及向多位陌生人傳送自身生殖器影像的「網路閃照（Cyberflashing）」。並且有研究指出，「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之行為已是國際間近年來漸趨嚴重之問題（Henry et al., 2020）。

經統計，每人遭受影像性虐待的終生盛行率（Lifetime Prevalence）大約為 8%，也就是說，每 100 人當中，就有 8 人曾遭受過影像性虐待（Klettke et al., 2014）。研究亦指出，此類犯罪存有極大的犯罪黑數，因加害者可能為防止事件被揭露或曝光而採取威脅或強迫手段，致被害者難以甚或無法報告其受害經歷（Brackenridge et al., 2008）。而此種犯罪屬非接觸式性暴力，雖加害者與被害者並未實際上觸碰到對方，卻仍會對被害者造成實質傷害，致使被害者產生許多負面情緒，進而嚴重影響身心健康（Henry et al., 2019；McGlynn et al., 2021；Jeglic & Calkins, 2016）。

## 貳、散佈性影像中的「性別」與「身分重疊」

青少年性教育常將性簡訊描述為危險行為，並僅強調「女性合意傳送性簡訊」須受到指責，卻絲毫未提及「男性非合意傳送性簡訊」一事，導致女性常遭受責任之歸咎，甚至感到自責，進而害怕尋求協助（Dobson & Ringrose, 2016；Mclocklin et al., 2024；Zauner, 2021）。然相對地，於犯罪防治的宣傳或相關資訊上，常僅以女性被害者視角進行敘事，致使男性被害者認為自己並不符合受協助之對象，從而拒絕尋求支持（Hine, 2019；Huntley et al., 2019）。綜上，於性簡訊或散佈性影像行為中，即便較多研究中發現女性較可能受到責備與不信任，然於男性亦可能有此現象發生。因此，Mclocklin 等人（2024）亦呼籲，若被害者之支持服務僅限

定某種特徵，將導致不符此特徵者受到排斥甚或選擇保持沉默，不再願意向外尋求協助。

而關於「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亦有研究顯示其與散佈性影像行為之關聯。依 Sparks 等人（2023）的研究顯示，散佈性影像行為中，「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之加害者與被害者間確實具顯著關聯（$x^2 = 31.420, p < .001$），且此犯罪類型之被害者曾施行過相同犯罪類型之加害行為的機率，顯著高於未曾施行加害行為者（$OR = 2.96$）；而「網路閃照」之加害者與被害者間亦具有顯著關聯（$x^2 = 14.930, p < .001$），且此犯罪類型之被害者曾施行過相同犯罪類型之加害行為的機率，亦顯著高於未曾施行加害行為者（$OR = 3.81$）。

身分重疊現象之可能原因則有諸多解釋。有研究指出，當親密關係破裂後，其中一方散佈了另一方的性私密影像，而另一方為進行報復，亦同樣實施散佈行為（Clancy et al., 2019）；另有研究顯示，曾非自願遭散佈性影像之被害者，可能會認同這樣的手段，藉此脅迫伴侶以延長雙方之戀愛關係，抑或是用以懲罰對自己提出分手的對象，然而動機部分並未獲得解釋（Muftić et al., 2015；Richards et al., 2017；Sparks et al., 2023）；亦有研究發現，前述「強迫性簡訊」與「網路閃照」等類型，在年輕世代眼中實為一種常態現象，如此一來將於潛移默化下鼓勵更多人從事該行為，而導致此類型之影像性虐待更加普遍（McGlynn & Johnson, 2021；Tziallas, 2015）。

至此，因現今新穎科技而產生的「散佈性影像」之犯罪型態，當中加害與被害之界線極為模糊，網路的便利性使得加害者與被害者之身分轉變漸趨快速，又因性別刻板印象之影響，導致性別與身分重疊之問題悄然浮現；再綜整前四節所述之三大論點，本研究將聚焦於近期盛行之「散佈性影像行為」，探討於該犯罪類型下，「被害者之性別」、「加害者之性別」與「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此三大焦點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影響，以及「公正世界信念」於其中所帶來的效果。

# 第三章　研究設計

##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現實環境中存有許多難以控制之變數，而透過操弄與控制住變項，將可增加內部效度並確保研究結果之可歸因性（Calder et al., 1981；Kim & Jang, 2014）。因此，本研究採模擬實驗法進行之，而整體研究為 2（被害者之生理性別：男 / 女）× 2（加害者之生理性別：男 / 女）× 2（被害者之身分類型：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 / 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之三因子實驗設計。研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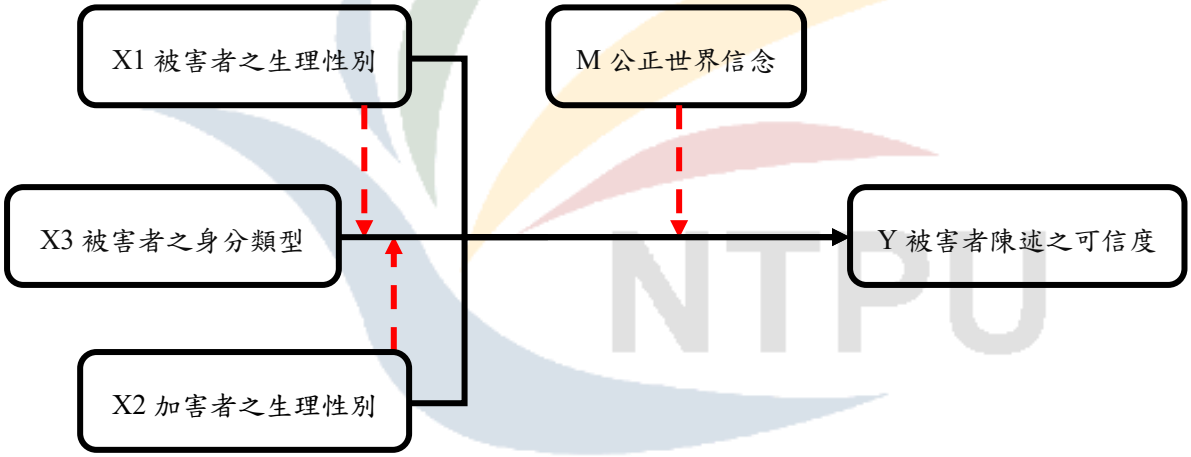



圖 3-1-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所設定之研究情境為散佈性影像，故被害者係於散佈性影像行為下受害。自變項 X1 為「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即本案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分為「男性」與「女性」；自變項 X2 為「加害者之生理性別」，即本案加害者之生理性別，分為「男性」與「女性」；自變項 X3 為「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其中分為：未有過任何加害經驗而僅為本案散佈性影像被害者之「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以及曾於他案實施過加害行為、現為本案散佈性影像被害者之「有過去加害經驗

之被害者」；依變項 Y 為「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即受試者是否相信本案被害者所陳述之內容；調節變項 M 為「公正世界信念」，即受試者抱持公正世界信念之程度。

本研究之假設如下：

H1. 「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顯著影響，且當被害者為女性時，其陳述將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

H2. 「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顯著影響，且當加害者為男性時，該案被害者之陳述將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

H3. 「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顯著影響，且「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之陳述將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

H4. 「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與「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交互作用效果；且當被害者為女性且無過去加害經驗時，其陳述將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

H5. 「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三因子交互作用效果；且當被害者為女性且無過去加害經驗，而加害者為男性時，其陳述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

H6. 「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與「M 公正世界信念」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交互作用效果；當受試者具有較強烈之公正世界信念，且被害者為男性時，則該受試者會偏向認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低。

H7. 「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M 公正世界信念」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交互作用效果；當受試者具有較強烈之公正世界信念，且加害者為女性時，則該受試者會偏向認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低。

H8. 「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與「M 公正世界信念」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交互作用效果；當受試者具有較強烈之公正世界信念，且被害者具有過去加害經驗時，則該受試者會偏向認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低。

另，為確保受試者清楚瞭解本研究中模擬情境之描述內容，故於正式施測前先行實施預試，藉此修正模擬情境之用詞準確度，並確認語句之通順流暢。

## 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與研究程序

本研究採 2×2×2 之三因子完全受試者間設計，共有八個實驗情境。

壹、預試

採便利抽樣，招募 8 位受試者接受預試，每一模擬情境各一位，其中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各 4 人，年齡皆為 18 歲以上。

以問卷之形式，於受試者閱讀知情同意書並確認同意後，請受試者閱讀研究者所挑選的其中一種模擬情境；而經受試者將情境相關法條與模擬情境閱讀完畢，始依序填答以下題目：（一）是否相信被害者之陳述，採 Likert 六點選項；（二）操弄檢核題。綜上，作答之總時長約為 5 分鐘。

經預試施測，8 位受試者皆通過操弄檢核，故維持原有之情境敘述繼續進行正式施測。

貳、正式施測

採隨機抽樣，以問卷之形式進行資料收集，並藉由通訊軟體與社群網站發放此問卷，招募 18 歲以上之受試者填寫。問卷開放期間為 2026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6 日。

於受試者閱讀知情同意書並確認同意後，受試者將被隨機分派至其中一種情境；而經受試者將情境相關法條與模擬情境閱讀完畢，始依序填答以下題目：（一）是否相信被害者之陳述，採 Likert 六點選項；（二）操弄檢核題；（三）全球公正世界信念量表；（四）人口學資料。綜上，作答之總時長約為 10 分鐘。

共有 496 位受試者完成問卷，其中有 146 位受試者未能正確回答操弄檢核題；刪除未通過操弄檢核之資料後，最終有效樣本數為 350 份。

##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完整問卷如附錄一所示（以情境五為例）。

壹、模擬情境設計與操弄檢核題

一、模擬情境

本研究參考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14 年度訴字第 229 號判決之案例事實（摘錄內容如附錄二所示），加以改編為以下八種模擬情境：

(一) 情境一：被害者為生理男性，且為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加害者為生理男性。

以下為小奇（生理男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奇，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 11 月 7 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窈窕的女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婷，也是單身未婚，且他身上散發出一種特殊的淑女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確認了戀人關係，並且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網路上瘋傳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 月 5 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因為阿婷的哥哥在阿婷手機內發現了這張照片，一心認為我是

個只想要騙色的渣男，一氣之下，竟趁阿婷不注意時將這張照片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他竟然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不可饒恕！」

**(二) 情境二：被害者為生理男性，且為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加害者為生理女性。**

以下為小奇（生理男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奇，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 11 月 7 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窈窕的女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婷，也是單身未婚，且他身上散發出一種特殊的淑女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確認了戀人關係，並且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網路上瘋傳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 月 5 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因為阿婷的姊姊在阿婷手機內發現了這張照片，一心認為我是個只想要騙色的渣男，一氣之下，竟趁阿婷不注意時將這張照片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他竟然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不可饒恕！」

**(三) 情境三：被害者為生理女性，且為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加害者為生理男性。**

以下為小琦（生理女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琦，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 11 月 7 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壯碩的男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廷，也是單身未婚，且他身上散發出一種特殊的紳士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確認了戀人關係，並且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網路上瘋傳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 月 5 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因為阿廷的哥哥在阿廷手機內發現了這張照片，一心認為我是個只想要騙色的渣女，一氣之下，竟趁阿廷不注意時將這張照片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他竟然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不可饒恕！」

**(四) 情境四：被害者為生理女性，且為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加害者為生理女性。**

以下為小琦（生理女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琦，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 11 月 7 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壯碩的男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廷，也是單身未婚，且他身上散發出一種特殊的紳士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確認了戀人關係，並且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網路上瘋傳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 月 5 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因為阿廷的姊姊在阿廷手機內發現了這張照片，一心認為我是個只想要騙色的渣女，一氣之下，竟趁阿廷不注意時將這張照片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他竟然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不可饒恕！」

**(五) 情境五：被害者為生理男性，且曾於他案實施加害行為，屬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加害者為生理男性。**

以下為小奇（生理男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奇，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 11 月 7 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窈窕的女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婷，雖是已婚已有丈夫，但他身上仍散發出一種特殊的淑女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阿婷的老公散佈出去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 月 5 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阿婷的老公在使用阿婷的手機時發現了這張照片，一氣之下就把它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我承認我不該在知道阿婷已婚的狀況下，還一直約阿婷來我家，我知道我侵害了別人的配偶權，但阿婷的老公也不能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

**(六) 情境六：被害者為生理男性，且曾於他案實施加害行為，屬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加害者為生理女性。**

以下為小奇（生理男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奇，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 11 月 7 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窈窕的女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婷，雖是已婚已有丈夫，但他身上仍散發出一種特殊的淑女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阿婷老公的姊姊散佈出去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 月 5 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阿婷的老公在使用阿婷的手機時發現了這張照片，一氣之下便轉發給他的姊姊並向其訴苦，而阿婷老公的姊姊因替他抱不平，就把它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我承認我不該在知道阿婷已婚的狀況下，還一直約阿婷來我家，我知道我侵害了別人的配偶權，但阿婷老公的姊姊也不能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

**(七) 情境七：被害者為生理女性，且曾於他案實施加害行為，屬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加害者為生理男性。**

以下為小琦（生理女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琦，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 11 月 7 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壯碩的男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廷，雖是已婚已有妻子，但他身上仍散發出一種特殊的紳士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阿廷老婆的哥哥散佈出去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 月 5 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阿廷的老婆在使用阿廷的手機時發現了這張照片，一氣之下便轉發給他的哥哥並向其訴苦，而阿廷老婆的哥哥因替他抱不平，就把它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我承認我不該在知道阿廷已婚的狀況下，還一直約阿廷來我家，我知道我侵害了別人的配偶權，但阿廷老婆的哥哥也不能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

**(八) 情境八：被害者為生理女性，且曾於他案實施加害行為，屬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加害者為生理女性。**

以下為小琦（生理女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琦，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 11 月 7 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壯碩的男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廷，雖是已婚已有妻子，但他身上仍散發出一種特殊的紳士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阿廷的老婆散佈出去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 月 5 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阿廷的老婆在使用阿廷的手機時發現了這張照片，一氣之下就把它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我承認我不該在知道阿廷已婚的狀況下，還一直約阿廷來我家，我知道我侵害了別人的配偶權，但阿廷的老婆也不能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

## 二、各情境所附條文

並且，於受試者開始閱讀情境前，先行附上與情境內加害行為相關之法條供受試者閱讀。各情境所附條文如下：

### (一) 情境一至情境四所附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8 項第 2 款與第 4 款：
稱性影像者，謂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
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
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9-3 條第 1 項：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其性影像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 (二) 情境五至情境八所附條文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民法》第 195 條：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 10 條第 8 項第 2 款與第 4 款：

稱性影像者，謂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

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

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9-3 條第 1 項：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其性影像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三、操弄檢核題

另，當受試者將法條與情境內容閱讀完畢後，須回答三道操弄檢核題，藉此檢驗該位受試者是否正確理解情境內容或是否專心閱讀情境，並且排除未正確回答檢核題之資料。三道操弄檢核題皆為選擇題，且依各情境而有不同正確答案。檢核題內容如表 3-4-1 所示；各情境對應之選項如表 3-4-2 所示。

**表3-4-1 操弄檢核題**

| 題目內容 |
| --- |
| 題01. 小奇（或小琦）的生理性別為？ |
| 題02. 是誰在網路上散佈小奇（或小琦）的裸照？ |
| 題03. 小奇（或小琦）在自己的裸照被散佈前，曾經做出何種加害行為？ |

**表3-4-2 各情境之操弄檢核題選項**

| | 題01. | 題02. | 題03. |
|---|---|---|---|
| 情境一 | (A)男性* | (A)阿婷的哥哥* | (A)殺人 |
| | (B)女性 | (B)阿婷的姊姊 | (B)散佈他人性影像 |
| | (C)不知道 | (C)不知道 | (C)侵害他人配偶權 |
| 情境二 | (A)男性* | (A)阿婷的哥哥 | (D)無* |
| | (B)女性 | (B)阿婷的姊姊* | (E)不知道 |
| | (C)不知道 | (C)不知道 | |
| 情境三 | (A)男性 | (A)阿廷的哥哥* | |
| | (B)女性* | (B)阿廷的姊姊 | |
| | (C)不知道 | (C)不知道 | |
| 情境四 | (A)男性 | (A)阿廷的哥哥 | |
| | (B)女性* | (B)阿廷的姊姊* | |
| | (C)不知道 | (C)不知道 | |
| 情境五 | (A)男性* | (A)阿婷的丈夫* | (A)殺人 |
| | (B)女性 | (B)阿婷丈夫的姊姊 | (B)散佈他人性影像 |
| | (C)不知道 | (C)不知道 | (C)侵害他人配偶權* |
| 情境六 | (A)男性* | (A)阿婷的丈夫 | (D)無 |
| | (B)女性 | (B)阿婷丈夫的姊姊* | (E)不知道 |
| | (C)不知道 | (C)不知道 | |
| 情境七 | (A)男性 | (A)阿廷妻子的哥哥* | |
| | (B)女性* | (B)阿廷的妻子 | |
| | (C)不知道 | (C)不知道 | |
| 情境八 | (A)男性 | (A)阿廷妻子的哥哥 | |
| | (B)女性* | (B)阿廷的妻子* | |
| | (C)不知道 | (C)不知道 | |

註：*為該題正確答案

貳、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此量表用以測量個體對於「世界的運作是公平正義的，且人們會得到他們所應得的事物」觀點之認同程度。本研究採用 Lipkus（1991）所開發的全球公正世界信念量表（Glob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GBJWS），並以 Reich 與 Wang（2015）的中文翻譯版進行施測。此量表為單一向度，共 7 題，無反向題。作答形式依照 Reich 與 Wang（2015）的中文翻譯版，採 Likert 七點式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將各題分數加總後即為本量表總分。

過去研究皆顯示 GBJWS 量表具有相當好之效度，例如 Westfall 等人（2019）的研究指出 GBJWS 量表具有不錯的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而 Lipkus（1991）的研究亦顯示出 GBJWS 量表具有相當良好的結構效度（factorial Validity）與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另，Reich 與 Wang（2015）的中文翻譯版亦顯示不錯的效度，且於針對中國大學生的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為.739；而本研究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為.796。量表題目內容如表 3-4-3 所示。

**表3-4-3 全球公正世界信念量表**

| 題目內容 |
| --- |
| 01. 我覺得大多數人都會得到他們應當獲得的。 |
| 02. 我覺得一個人的努力終會被注意到並得到相應的報酬。 |
| 03. 我覺得人們得到的獎賞與懲罰都是他們應得的。 |
| 04. 我覺得人們遭遇的不幸是他們自己引來的。 |
| 05. 我覺得人們終將得到他們理所應得的。 |
| 06. 我覺得世上的賞與罰的報應是公平的。 |
| 07. 我覺得這個世界基本上還是很公平的。 |

參、人口學變項

於問卷最末調查受試者之基本資料，當中包含生理性別、性別認同、出生年份、教育程度、就業狀態、職業領域、科系、婚姻狀態與宗教信仰等。

# 第四章　研究結果

## 第一節　描述統計分析

壹、人口學變項分析

人口學變項之次數分配表如表 4-1-1 所示。

於「生理性別」部分，男性共 120 人（34.3%），女性共 230 人（65.7%）。於「性別認同」部分，男性共 118 人（33.7%），女性共 228 人（65.2%），而其他非選項內之性別認同者共 4 人（1.1%）。

於「年齡」部分，以民國 115 年為準，扣除受試者於問卷內填寫之出生民國年份後，所得者即為受試者之年齡，再依內政部統計處之年齡區分標準，進一步分為青年（18 歲以上未滿 24 歲）、壯年（24 歲以上未滿 40 歲）、中年（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與老年（65 歲以上）；而於收集之資料中，青年共 21 人（6.0%），壯年共 280 人（86.0%），中年共 48 人（13.7%），老年共 1 人（0.3%）。

於「最高教育程度部分」部分，高中（職）共 15 人（4.3%），大學或大專院校共 192 人（54.9%），研究所（含）以上者共 143 人（40.9%）。於「就業狀態」部分，目前無工作或待業中者為 73 人（20.9%），兼職工作者為 46 人（13.1%），全職工作者為 229 人（65.4%），已退休者共 2 人（0.6%）。

於「職業領域」部分，依行政院主計總處之職業類別區分，排除 88 位現無職業者（25.1%）後，人數最多者為教育業，共 51 人（14.6%）；人數次多者為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共 41 人（11.7%）。於「是否曾從事法律相關工作」部分，曾從事過法律相關工作者為 19 人（5.4%），未從事過者為 331 人（94.6%）。於「現為學生者之科系領域」部分，排除 234 位現非學生者（66.9%）後，人數最多者為社會科學領域，共 45 人（12.9%）；人數次多者為法政領域，共 20 人（5.7%）。

於「婚姻狀態」部分，未婚者共 308 人（88.0%），已婚者共 37 人（10.6%），離婚者共 5 人（1.4%）。於「宗教信仰」部分，排除 214 位無宗教信仰者（61.1%）後，人數最多者為道教，共 73 人（20.9%）；人數次多者為佛教且無皈依，共 32 人（9.1%）。

**表4-1-1 人口學變項之次數分配表**

| | | *N* | % |
|---|---|---|---|
| 生理性別 | 男性 | 120 | 34.3 |
| | 女性 | 230 | 65.7 |
| 性別認同 | 男性 | 118 | 33.7 |
| | 女性 | 228 | 65.2 |
| | 其他 | 4 | 1.1 |
| 年齡 | 青年（18歲以上未滿24歲） | 21 | 6.0 |
| | 壯年（24歲以上未滿40歲） | 280 | 86.0 |
| | 中年（40歲以上未滿65歲） | 48 | 13.7 |
| | 老年（65歲以上） | 1 | 0.3 |
| 最高教育程度 | 高中（職） | 15 | 4.3 |
| | 大學、大專院校 | 192 | 54.9 |
| | 研究所（含）以上 | 143 | 40.9 |
| 就業狀態 | 無、待業中 | 73 | 20.9 |
| | 兼職工作 | 46 | 13.1 |
| | 全職工作 | 229 | 65.4 |
| | 已退休 | 2 | 0.6 |
| 職業領域 | 無 | 88 | 25.1 |
| | 家庭主夫（婦） | 2 | 0.6 |
| | 農、林、漁、牧業 | 1 | 0.3 |
| | 製造業 | 33 | 9.4 |
| |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1 | 0.3 |
| | 營建工程業 | 7 | 2.0 |
| | 批發及零售業 | 11 | 3.1 |
| | 運輸及倉儲業 | 1 | 0.3 |
| | 住宿及餐飲業 | 6 | 1.7 |
| |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 7 | 2.0 |
| | 金融及保險業 | 19 | 5.4 |
| | 不動產業 | 1 | 0.3 |
|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 32 | 9.1 |

（續下頁）

| | | *N* | % |
|---|---|---|---|
| | 支援服務業 | 4 | 1.1 |
|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 19 | 5.4 |
| | 教育業 | 51 | 14.6 |
| |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 41 | 11.7 |
| |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 11 | 3.1 |
| | 其他服務業 | 15 | 4.3 |
| 曾從事法律相關工作 | 有 | 19 | 5.4 |
| | 無 | 331 | 94.6 |
| 現為學生者之科系領域 | 教育 | 7 | 2.0 |
| | 人文 | 11 | 3.1 |
| | 社會科學 | 45 | 12.9 |
| | 法政 | 20 | 5.7 |
| | 管理 | 8 | 2.3 |
| | 醫藥衛生 | 3 | 0.9 |
| | 農 | 2 | 0.6 |
| | 理工 | 17 | 4.9 |
| | 資訊 | 2 | 0.6 |
| | 大眾傳播 | 1 | 0.3 |
| | 現非學生者 | 234 | 66.9 |
| 婚姻狀態 | 未婚 | 308 | 88.0 |
| | 已婚 | 37 | 10.6 |
| | 離婚 | 5 | 1.4 |
| 宗教信仰 | 無 | 214 | 61.1 |
| | 佛教，有皈依 | 5 | 1.4 |
| | 佛教，無皈依 | 32 | 9.1 |
| | 道教 | 73 | 20.9 |
| | 天主教 | 1 | 0.3 |
| | 基督教 | 21 | 6.0 |
| | 彌勒大道 | 1 | 0.3 |
| | 一貫道 | 1 | 0.3 |
| | 佛道皆有 | 2 | 0.6 |
| *N* | 350 | | |

貳、主要研究變項之基本數值

本研究為 2(被害者之生理性別：男 / 女)×2(加害者之生理性別：男 / 女)×2(被害者之身分類型：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 / 有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模擬實驗，主要測量不同情境之下的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以及受試者本身之公正世界信念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影響。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加害者之生理性別」及「被害者之身分類型」之三大主要研究變項，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描述性統計，如表 4-1-2 所示，並依各變項列出其平均數與標準差。當被害者為女性且具加害經驗，而加害者為男性時，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平均分數最高（$M = 4.29, SD = 1.20$）；而當被害者為男性且不具加害經驗，而加害者為女性時，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平均分數最低（$M = 3.59, SD = 1.09$）。

**表4-1-2 三大主要研究變項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描述性統計（*N* = 350）**

| 被害者 | | 男性加害者 | | 女性加害者 | |
|---|---|---|---|---|---|
| | | *N* | *M* (*SD*) | *N* | *M* (*SD*) |
| 無加害經驗 | 男性 | 42 | 3.93 (1.07) | 39 | 3.59 (1.09) |
| | 女性 | 50 | 4.16 (1.08) | 42 | 4.10 (0.91) |
| 有加害經驗 | 男性 | 41 | 4.15 (1.04) | 38 | 3.95 (0.90) |
| | 女性 | 55 | 4.29 (1.20) | 43 | 4.16 (0.95) |

關於公正世界信念，其描述性統計如表 4-1-3 所示。本研究對全球公正世界信念量表之中文翻譯版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顯示，此量表之 Cronbach's α 內部一致性係數為.796，依 DeVellis（1991）之標準，具不錯之信度。而所有受試者之公正世界信念平均分數為 25.42（$SD = 6.67$）。

**表4-1-3 公正世界信念之描述性統計**

| | *M* | *SD* | *N* | *α* |
|---|---|---|---|---|
| 公正世界信念 | 25.42 | 6.67 | 350 | .796 |

參、各變項間相關

本研究之人口學變項與主要研究變項間之相關，如表 4-1-4 所示。

類別變項間之相關以 Cramer's V 表示，連續變項間之相關以 Pearson's *r* 表示，而類別變項與連續變項間之相關則以 Eta 係數呈現。

觀諸本研究之主要變項，大多不具顯著相關，僅「被害者之生理性別」與「被害者陳述可信度」具顯著相關且具小效果，$\eta_p^2 = .01$，$p = .025 < .05$；以及「被害者陳述可信度」與「公正世界信念」具顯著相關且具小效果，$r(348) = .11$，$p = .039 < .05$。

另，「年齡」與「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相關，以及「學生之科系領域」與「公正世界信念」之相關，因無論採何種原始分數之轉換方式皆無法通過同質性假定，故對於兩者相關係數之解讀應更保守對待之。

**表4-1-4 各變項間之相關（*N* = 350）**

|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
| 1. 生理性別 | - | | | | | | | | | | | | | | |
| 2. 性別認同 | .95*** | - | | | | | | | | | | | | | |
| 3. 年齡 | .09 | .07 | - | | | | | | | | | | | | |
| 4. 最高教育程度 | .08 | .09 | .30*** | - | | | | | | | | | | | |
| 5. 就業狀態 | .06 | .05 | .46*** | .21*** | - | | | | | | | | | | |
| 6. 職業領域 | .23 | .20 | .30*** | .31** | .51*** | - | | | | | | | | | |
| 7. 曾從事法律相關工作 | .06 | .09 | .06 | .02 | .09 | .37*** | - | | | | | | | | |
| 8. 學生之科系領域 | .48** | .45** | .34 | .36* | .37* | .42*** | .33 | - | | | | | | | |
| 9. 婚姻狀態 | .09 | .07 | .51*** | .11 | .19*** | .33*** | .02 | .28 | - | | | | | | |
| 10.宗教信仰 | .09 | .36*** | .29*** | .14 | .20** | .24 | .14 | .28 | .21* | - | | | | | |
| 11.被害者之生理性別 | .10* | .12 | .05 | .07 | .09 | .26 | .05 | .36 | .02 | .16 | - | | | | |
| 12.加害者之生理性別 | .10 | .09 | .07 | .04 | .13 | .21 | .03 | .28 | .12 | .15 | .03 | - | | | |
| 13.被害者之身分類型 | .02 | .06 | .10 | .04 | .09 | .20 | .04 | .16 | .03 | .12 | .02 | .01 | - | | |
| 14.被害者陳述可信度 | .01* | .01 | .02* | .01 | .01 | .08* | .00 | .16* | .02* | .01 | .01* | .00 | .00 | - | |
| 15.公正世界信念 | .00 | .00 | .01 | .00 | .00 | .05 | .00 | .03 | .02** | .03 | .00 | .00 | .00 | .11* | - |

*$p$<.05　**$p$<.01　***$p$<.001

## 第二節　主要研究發現

壹、三大主要變項與「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關係

以三因子獨立樣本 ANOVA 分析「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效果，結果如表 4-2-1 所示。

本研究的假設一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顯著影響，且當被害者為女性時，其陳述將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而研究結果顯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對「Y 被害者陳述可信度」具有顯著效果，$F(1, 342) = 5.99$，$p = .015 < .05$，$\eta_p^2 = .017$。並進一步分析顯示：女性被害者（$M = 4.18, SD = 1.05$）之陳述可信度顯著高於男性被害者（$M = 3.91, SD = 1.04$）。故整體而言，假設一獲得支持。

本研究的假設二為：「『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顯著影響，且當加害者為男性時，該案被害者之陳述將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研究結果顯示：「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對「Y 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並不具有顯著效果，$F(1, 342) = 2.66$，$p = .104 > .05$，$\eta_p^2 = .008$。因此，假設二未獲得支持。

本研究的假設三為：「『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顯著影響，且『無過去加害經驗之被害者』之陳述將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研究結果顯示：「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Y 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並不具備顯著效果，$F(1, 342) = 2.98$，$p = .085 > .05$，$\eta_p^2 = .009$。因此，假設三未獲得支持。

本研究的假設四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與『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交互作用效果；且當被害者為女性且無過去加害經驗時，其陳述將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而二因子交互作用分析顯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 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在「Y 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上不具有顯著交互作用效果，$F(1, 342) = 0.71$，$p = .401 > .05$，$\eta_p^2 = .002$。因此，假設四未獲得支持。

本研究的假設五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三因子交互作用效

果；且當被害者為女性且無過去加害經驗，而加害者為男性時，其陳述會獲得較高的可信度。」而三因子交互作用分析顯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 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 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在「Y 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上不具有顯著交互作用效果，$F(1, 342) = 0.21$，$p = .651 > .05$，$\eta_p^2 = .001$。因此，假設五未獲得支持。

**表4-2-1 三大主要變項於「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上之*ANOVA***

| 變異來源 | *SS* | *df* | *MS* | *F* | $\eta_p^2$ |
|---|---|---|---|---|---|
| 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 | 6.49 | 1 | 6.49 | 5.99* | .017 |
| 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 | 2.88 | 1 | 2.88 | 2.66 | .008 |
| 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 | 3.23 | 1 | 3.23 | 2.98 | .009 |
| X1 * X2 | 0.64 | 1 | 0.64 | 0.59 | .002 |
| X1 * X3 | 0.7 | 1 | 0.77 | 0.71 | .002 |
| X2 * X3 | 0.03 | 1 | 0.03 | 0.03 | < .001 |
| X1 * X2 * X3 | 0.22 | 1 | 0.22 | 0.21 | .001 |
| 誤差 | 370.78 | 342 | 1.08 | | |
| 總和 | 384.85 | 349 | | | |

*$p$<.05 **$p$<.01 ***$p$<.001

貳、「公正世界信念」之調節效果

以階層迴歸檢驗「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被害者之身分類型」與「公正世界信念」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效果，分析結果如表 4-2-2 所示。研究結果顯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與「M 公正世界信念」的主要效果可以解釋「Y 被害者陳述可信度」變異中的 4%，$F(4, 345) = 3.85$，$p = .004 < .01$。而在控制了主要效果之後，「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 M 公正世界信念」的交互作用、「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 M 公正世界信念」的交互作用與「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 M 公正世界信念」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加 1%的「Y 被害者陳述可信度」變異，$F(3, 342) = 1.33$，$p = .264 > .05$，然而此一效果並不顯著。

本研究的假設六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與『M 公正世界信念』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交互作用效果；當受試者具有較強烈之公正世界信念，

且被害者為男性時，則該受試者會偏向認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低。」而研究結果顯示：「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M 公正世界信念」的交互作用不具有顯著解釋力（$\beta = .05, p = .520 > .05$）。因此，假設六未獲得支持。

本研究的假設七為：「『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M 公正世界信念』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交互作用效果；當受試者具有較強烈之公正世界信念，且加害者為女性時，則該受試者會偏向認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低。」而研究結果顯示：「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M 公正世界信念」的交互作用不具有顯著解釋力（$\beta = -.01, p = .894 > .05$）。因此，假設七未獲得支持。

本研究的假設八為：「『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與『M 公正世界信念』對『Y 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具有交互作用效果；當受試者具有較強烈之公正世界信念，且被害者具有過去加害經驗時，則該受試者會偏向認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低。」而研究結果顯示：「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M 公正世界信念」的交互作用不具有顯著解釋力（$\beta = -.13, p = .064 > .05$）。因此，假設八未獲得支持。

**表4-2-2 三大主要變項與「公正世界信念」之交互作用分析**

| | 被害者陳述可信度 | |
|---|---|---|
| | $\Delta R^2$ | $\beta$ |
| *Step 1* | .04** | |
| 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 | | -.13* |
| 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 | | .08 |
| 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 | | .09 |
| M 公正世界信念 | | .10 |
| *Step 2* | .01 | |
| X1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 | | -.12* |
| X2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 | | .08 |
| X3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 | | .08 |
| M 公正世界信念 | | .17 |
| X1*M交互作用 | | .05 |
| X2*M交互作用 | | -.01 |
| X3*M交互作用 | | -.13 |
| Total $R^2$ | .05** | |
| $N$ | 350 | |

*$p$<.05 **$p$<.01 ***$p$<.001

#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 第一節　研究摘述

本研究主要探討於近期盛行之「散佈性影像行為」下，「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此三大焦點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影響，以及「公正世界信念」於其中所帶來的效果。過去研究顯示，現有的性別基模會促使社會大眾將事件之被害者預設為女性，將加害者預設為男性，且僅有無辜脆弱的理想被害者始能受到社會所信任；然若被害者之背景不符合前述社會大眾所預設之條件，便會受到公眾之責備與質疑，進一步影響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尤其公正世界信念程度愈高之個體，對被害者之譴責程度愈高。另，隨著科技進展已漸趨發展出許多新型犯罪態樣，而數位環境的便利亦使得這些犯罪更易於完成，尤以「散佈性影像」最為嚴重，每 100 人當中就有 8 人曾經被害。

研究者依此推論：理想被害者之概念亦會顯露於現今新型態之「散佈性影像行為」犯罪當中，意即，當散佈性影像事件之被害者為無加害經驗之女性，且加害者為男性時，該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最高；而公正世界信念程度愈高之受試者，愈傾向於認為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低。

而研究結果顯示：

a. 當被害者為女性時，其陳述可信度顯著較高；假設一獲得支持。
b. 當加害者為男性時，該案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並未顯著較高；假設二未獲得支持。
c. 當被害者無過去加害經驗時，其陳述可信度並未顯著較高；假設三未獲得支持。
d.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與「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沒有產生交互作用效果；假設四未獲得支持。

e.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被害者之身分類型」對「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沒有產生三因子交互作用效果；假設五未獲得支持。

f. 「被害者之生理性別」與「公正世界信念」對「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沒有產生交互作用效果；假設六未獲得支持。

g. 「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與「公正世界信念」對「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沒有產生交互作用效果；假設七未獲得支持。

h. 「被害者之身分類型」與「公正世界信念」對「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沒有產生交互作用效果；假設八未獲得支持。

綜上，依研究結果顯示，僅有假設一獲得支持，也就是說，對於散佈性影像事件中之被害者陳述可信度，僅「被害者之生理性別」為一較關鍵之影響因素。接著，將分別針對各個研究結果進行深入討論與分析。

NTPU

## 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論

依前述研究結果，可綜整出四項結論，分述如下。

### 壹、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取決於其「性別」

首先，觀諸本研究之所有研究結果，僅假設一獲得支持，意即，僅「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具有顯著影響，又以女性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較高。此一研究結果與過往研究相符（Drijber et al., 2013；Depraetere et al., 2020；Machado et al., 2016），不外乎是再次驗證了性別刻板印象至今仍存在於社會當中，更代表著於散佈性影像犯罪之下，性別刻板印象亦體現於其中。

而此一研究結果實為有跡可循。依 Said 與 McNealey（2023）的研究指出，當性犯罪之被害者為女性時，社會大眾會較相信此確實為一「真實被害經歷」，進而提供該位女性被害者相關協助與建議；然若當被害者為男性，則會受到質疑，且案件之嚴重性會遭淡化，常被認為是溝通不良所造成的「誤會」。男性強暴迷思（Male Rape Myths）之概念亦是由此而來，，此一性別因素所造就的信任度落差，勢必會導致個體尋求協助的意願降低（Ralston, 2020；Walfield, 2021）。

再以何春蕤（1994）所提的賺賠邏輯加以解釋。該理論認為，社會常將「女性身體被看見」視作「賠」，而將「男性身體被看見」視作「賺」，因此，當遭散佈性影像的被害者為男性時，社會潛意識會將「男性無論如何都是賺」的框架套用於案件，進而認為該位男性被害者不但沒有損失，反而可能從中獲得某種炫耀或成就感；反之，女性被害者則完全符合社會的預期，故可信度較高。

接續前述「女性被害者符合社會預期」之反面論述，非常值得再進行深入討論。當公眾傾向於確信女性的被害經歷為真，此亦代表社會價值觀一致將性暴力之被害者預設為「女性」，此一預設心態實際上亦是濫觴於性別刻板印象（Zvi & Shechory-Bitton, 2020）。如同 Mclocklin 等人（2024）於研究中提及的，若於性影像犯罪之防治宣導中過度強調「女性被害者」之角色，不但會使大眾忽視「真正

需要幫助的人」，亦會間接加深社會對女性的道德要求，最終又使女性被貼上「蕩婦羞辱（Slut-shaming）」之標籤，終而形成一惡性循環。

這社會上存有許多不必要的性別差異，多數皆來自於傳統價值觀念，以及對性別的刻板印象等，最終則演變為性別歧視，而所有對於女性的責任歸咎、對於男性的強暴迷思，其實皆屬性別歧視的一環，亦理所當然皆屬父權下的產物（Whatley, 1996）。值得反思的是，本研究之受試者以年輕族群居多，且教育程度亦偏高，然性別刻板印象卻仍存在，此一結果也正代表著隱性偏見難以輕易抹滅與消除，或許可再針對未成年族群進行研究，觀察性別刻板印象是否亦存在於更加年輕的世代之中。

貳、被害者陳述之可信度與「加害者之性別」無顯著相關

不同於前述之被害者性別，依本研究之研究結果顯示，「加害者之生理性別」並未對該案「被害者陳述可信度」產生顯著影響。依研究者推測，可能有三點原因促使此一研究結果發生。

首先，Dickinson 與 Roberts（2025）的研究指出，人們在評斷性犯罪案件時，可能會受到資訊的「呈現順序」影響，也就是說，「先看見被害者的資訊」與「先看見加害者的資訊」二種情境差異會導致被害者的可信度與受責備程度有所不同；此一現象可能與初始效應（Primacy Effect）有關，即人們會受到最先出現的資訊影響，並且因定錨效果（Anchoring Effect）而將這項資訊視為判斷其他資訊的標準或關鍵（Asch, 1946；Stuart et al., 2019）。基此，本研究之情境開頭為被害者對自身資訊的描述，此一呈現順序可能導致受試者將著眼點置於被害者本身，而非加害者之性別。

再依過往針對性犯罪加害者的研究發現，通常會將情境描寫得非常暴力且具體（Ayala et al., 2018；Gerber et al., 2004）。然於本研究中，模擬情境之加害行為屬無實體暴力之「散佈性影像」，因此，情境本身的設計亦可能是本研究關於「加害者之生理性別」之假設不成立的原因之一。

最後一種可能的原因，係來自「未經同意散佈性影像」犯罪行為本身之特殊性。McGlynn 與 Rackley（2017）指出，影像性虐待（Image-Based Sexual Abuse, IBSA）之核心損害在於對被害者之性尊嚴、性自主權與隱私權的嚴重侵犯，並將此歸納為一種「文化傷害（Cultural Harm）」，即此種犯罪不只會對個人造成損害，而是會連帶影響到整個社會。基於此一論點，受試者於閱讀情境時亦可能僅會關注此種犯罪的特殊性，相較之下，加害者之性別便不會產生過大的影響。

參、理想被害者之概念並未全然反映於散佈性影像行為

本研究之研究結果顯示，「被害者之身分類型」並未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產生顯著影響，換言之，被害者「有無過去加害經驗」一事並不會造成其陳述可信度之差異，而此一結果與「理想被害者」之概念相悖。於此，研究者認為此一假設不成立之原因有三。

第一，回顧先前文獻可知，眾多研究皆指出現今有許多犯罪類型存在「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而於數位環境之中，加害與被害之界線又模糊許多，重疊現象理所應當更是不在少數（McGlynn & Johnson, 2021；Sparks et al., 2023）。研究者依此推論，當身分重疊現象已屬常態之時，社會大眾對此已然理解其箇中緣由甚或懷抱更高的容錯程度，基此，「被害者的過去加害經驗」便不必然會成為一能輕易左右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重要因素。

第二，回歸本研究之模擬情境本身，被害者之過去加害行為屬於「侵權行為」而非「犯罪行為」；然於 Campbell 等人（2015）針對性犯罪被害者的研究中發現，被害者前科記錄之嚴重程度會大幅影響調查人員對該被害者的信任程度，尤以偽造文書或偽證等具欺騙性質之犯罪，影響程度最為劇烈。對此，研究者建議，未來於「加、被害者身分重疊現象」的研究中，可針對模擬情境之設定多加著墨，若能尋得更加合適之相關判決書作為模擬情境參考，勢必可分析出更為準確之結果。

第三，或許已是時候能坦然並樂觀看待臺灣社會觀念的進展。蔡宜家等人（2021）的研究中提及，近期法院已能於判決內容中公然駁斥「理想被害者」之

迷思，如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887 號判決[5]即屬一標竿判決。而隨著 107 年該判決的誕生，也許可期待於臺灣社會當中，關於理想被害者之偏見已漸消散，此亦留待日後研究加以證實臺灣的進步。

肆、公正世界信念不具調節作用

依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可發現，「公正世界信念」並未於「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加害者之生理性別」、「被害者有無過去加害經驗」三者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的關係中產生調節效果。此一結果與過往研究大相逕庭，據此，研究者回顧先前所讀之文獻後，推敲出了可能的原因。

眾多研究皆指出，抱持強烈公正世界信念之個體，係為了消除邏輯上的認知失調故進而責備事件中之被害者（Grubb & Harrower, 2008；Hafer et al., 2019）；而依 Epstein 與 Pacini（1999）提出的認知—經驗自我理論（Cognitive-Experiential Self-Theory, CEST）可知，人們主要透過兩種不同的資訊處理系統來應對周遭環境，分別是仰賴思考與邏輯的「理性系統（Rationalistic System）」以及純靠直覺與捷思的「經驗系統（Experiential System）」。

基此，Van den Bos 與 Maas（2009）藉此推論，只有當人們處於處理邏輯問題的理性系統之時，公正世界信念才會發揮調節作用。再依 Li 與 Zheng（2025）的研究顯示，當案件涉及當事人雙方認識或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時，觀察者更容易啟動「經驗系統」來判斷問題。因此，研究者依此推測，受試者在閱讀本研究之模擬情境時，可能傾向以直覺與捷思來判定被害者之陳述可信度，尚未進到深入理性思索之狀態，故未受公正世界信念影響，因而導致此一研究結果產生。

[5] 最高法院 107 年台上字第 887 號判決（摘）：「妨害性自主罪之被害人，殊無可能有典型之事後情緒反應及標準之回應流程，被害人與加害者間之關係、當時所處之情境、被害人之個性、被害人被性侵害之感受及被他人知悉性侵害情事後之處境等因素，均會影響被害人遭性侵害後之反應，所謂理想的被害人形象，僅存在於父權體制之想像中。」

##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 壹、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研究限制其一，便是前述已有約略提及之「情境設計」之問題。依本研究所關注之犯罪類型，即「散佈性影像行為」，原先研究者盼能覓得被害者之過去加害經驗亦同屬散佈性影像行為之案件判決書，如此一來方可緊扣「散佈性影像行為」之議題進而改編為模擬實驗情境，然攸關性別犯罪之判決基本不公開，實屬難尋，就研究者力所能及之範圍內仍無法尋獲類似之案件。

研究限制其二，依研究結果顯示，諸多假設並未獲得支持，而本研究之受試者多為年輕族群與高教育程度者，可能為假設不成立之因素之一。基此，研究者建議，應將受試者進行類型上的區分，另設一對照組以便直接分辨不同族群於「被害者陳述可信度」的判斷上是否有所差異，或直接針對未成年族群或老年族群加以研究，如此應可獲得較明確之研究結果。

研究限制其三，乃回歸本研究之操弄檢核題正確率之問題。本研究共有 496 位受試者填畢問卷，而其中，僅 350 位受試者通過操弄檢核，正確率約 71%。研究者進一步推測，導致操弄檢核正確率不高之原因，或情境內容描述過長，或情境中角色間之關係過於複雜，抑或是操弄之變項過多，使受試者無法聚焦於重點而分心，從而難以理解事件脈絡。

研究限制其四，縱使依研究結果發現，被害者之生理性別對被害者陳述可信度具有顯著影響，然而其解釋力並不高（$\eta_p^2 = .017$），故或許存在其他潛在影響因素，可留待日後更加深入之研究。

### 貳、政策建議

#### 一、潛移默化的起點——新聞媒體的性別教育

談及性別刻板印象，便絕不可忽視媒體報導中的用字遣詞，諸如新聞標題中常見的「被害女員工」或「被害女大學生」等，皆會特意將「女性」標註而出，

彷彿將標籤一張一張地貼上，讓人們談論的焦點從「被害」二字轉為「女」一字，亦讓輿論更加離不開特定性別；且數位時代之下，人們瀏覽一則新聞的時間極為快速，常在抓取關鍵字後便關掉頁面，而「被害者性別」便屬關鍵字之一。

研究者認為，應將「被害者性別平權」一事納入媒體倫理，尤以數位性別犯罪更為重要，藉此直接規範新聞報導中關於被害者性別之用詞，或於大眾傳播媒體相關科系中加以宣導，引導該產業之莘莘學子看見此一用字遣詞背後的社會對立，以期各家新聞於撰寫報導時，可日漸跳脫現有之性別分化問題。

二、潛移默化的過程——國民識讀教育

前述「快速瀏覽新聞並抓取關鍵字」一事，正是媒體識讀的一環，而於現今數位時代之下，識讀教育又益發重要。基此，研究者建議，應將媒體識讀教育正式納入國民教育當中，開設識讀教育課程，一步步指導學生如何正確判讀新聞報導與社群文章，並積極教導性別犯罪中的「被害者性別平權」之概念，盼能於多方薰陶下，淡化社會當中的性別刻板印象。

三、肯定社會觀念進步之餘，勿忘創傷知情

倘若本研究除性別刻板印象之外的研究結果，係來自臺灣社會觀念的進展，除給予肯定外，亦須提及另一有待進步之事項，即多數人仍缺乏的「創傷知情」這塊拼圖。隨著理想被害者的迷思漸被破除，未來政策方向應由「單純強調消除偏見」，轉而深化為「對創傷反應的理解」；換言之，人們應深入瞭解，創傷於神經生物學與個體心理層面所造成之影響，具有高度複雜性與異質性，導致個體在經歷被害之後，可能呈現出多種態樣的情緒反應與行為等，並非所有被害者的反應皆相同。

對此，研究者建議，於前述國民教育之識讀課程當中，應納入多種被害者反應之情境，引導學生知曉「理想被害者」並不存在，「理想的被害者反應」亦不存在，藉此帶出創傷知情之概念，讓學生在閱讀相關新聞時能不帶任何偏見色彩。與此同時，除再度讚賞最高法院於 107 年所作的判決外，亦期盼此份判決書內容

可被廣為宣導，讓更多民眾看見，讓更多判決能夠以此為典範，進而將正確之價值觀念渲染大眾，渲染社會，渲染整個臺灣。

## 四、總結：性別平權，被害者亦須平權

最後，期盼能有更多人瞭解，任何事件之被害者皆應被同等視之，不應因其性別而改變重視程度，亦不應因被害者之背景不符心中之預設條件即產生歧視甚或偏見。於本研究之最末，極其欣慰能看見臺灣社會觀念可能正走在進步的道路上，亦期許這條路能夠愈走愈順，愈走愈好。

NTPU

# 參考文獻

一、外文部分


Asch, S. (1946). Forming impressions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Abnormal Social Psychology, 41*, 258-290. https://doi.org/10.1037/h0055756

Abbey, A., Cozzarelli, C., McLaughlin, K., & Harnish, R. J. (1987). The effects of clothing and dyad sex composition on perceptions of sexual intent: Do women and men evaluate these cues differentl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2), 108-126.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1987.tb00304.x

Arias, I., & Johnson, P. (1989). Evaluations of physical aggression among intimate dyad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4*, 298-307.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89004003004

Ahmed, A. M., Aldén, L., & Hammarstedt, M. (2013). Perceptions of gay, lesbian, and heterosexual domestic violence among undergraduates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7*, 249-260. https://doi.org/10.4119/ijcv-3022

Ayala, E. E., Kotary, B., & Hetz, M. (2018). Blame attributions of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Effects of victim gender, perpetrator gender, and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3*(1), 94-116.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5599160

Broidy, L. M., Daday, J. K., Crandall, C. S., Sklar, D. P., & Jost, P. F. (2006). Exploring demographic, structural, and behavioral overlap among homicide offenders and victims. *Homicide Studies, 10*(3), 155-180. https://doi.org/10.1177/1088767906288577

Bornstein, B. H., Kaplan, D. L., & Perry, A. R. (2007). Child abuse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Lay perceptions of child sexual and physical abuse.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31*(4), 375-391.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06.09.007

Brackenridge, C. H., Bishopp, D., Moussalli, S., & Tapp, J. (2008).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abuse in sport: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 of events described in media repor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6*(4), 385-406. https://doi.org/10.1080/1612197X.2008.9671881

Beichner, D., & Spohn, C. (2012). Modeling the effects of victim behavior and moral

character on prosecutors' charging decisions in sexual assault cases. *Violence and Victims, 27*, 3-24.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27.1.3

Burkett, M. (2015). Sex(t) talk: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young adults' negotiations of the pleasures and perils of sexting. *Sexuality & Culture, 19*, 835-863. https://doi.org/10.1007/s12119-015-9295-0

Bonilla, S., McGinley, M., & Lamb, S. (2021). Sexting, power, and patriarchy: Narratives of sexting from a college popul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23*(5), 1099-1116.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20909517

Calder, B. J., Phillips, L. W., & Tybout, A. M. (1981). Designing research for applic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8*(2), 197-207. https://doi.org/10.1086/208856

Christie, N. (1986). The ideal victim. In E. A. Fattah (Ed.), *From Crime Policy to Victim Policy* (pp. 17-30).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07/978-1-349-08305-3_2

Correia, I., Alves, H., Morais, R., & Ramos, M. (2015). The legitimation of wife abuse among women: The impact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gender identific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6*(5), 7-1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4.11.041

Campbell, B. A., Menaker, T. A., & King, W. R. (2015). The determination of victim credibility by adult and juvenile sexual assault investigator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43*(1), 29-39. https://doi.org/10.1016/j.jcrimjus.2014.12.001

Clancy, E. M., Klettke, B., & Hallford, D. J. (2019). The dark side of sexting-factors predic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sex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2*, 266-272.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8.11.023

Chan, H. C. (2020). The victim-offender overlap in sexual offending: Exploring a community-based sample of young adults in Hong Kong. *Sexual Abuse, 33*(8), 923-949. https://doi.org/10.1177/1079063220981889

Cherniawsky, S., & Morrison, M. (2022). "You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The social ramifications of victimization-focused sexual assault prevention tip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7*(1-2).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20913650

DeVellis, R. F. (1991). *Scale Develop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Dalbert, C. (1999). The world is more just for me than generally: About the pers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s validity.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 79-98.

https://doi.org/10.1023/A:1022091609047

Drijber, B. C., Reijnders, U. J. L., & Ceelen, M. (2013). Male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 28*, 173-178. https://doi.org/10.1007/s10896-012-9482-9

Droogendyk, L., & Wright, S. C. (2014). Perceptions of interpersonal versus intergroup violence: The case of sexual assault. *PLoS One, 9*(1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12365

Dobson, A. S., & Ringrose, J. (2016). Sext education: Pedagogies of sex, gender and shame in the schoolyards of tagged and exposed. *Sex Education, 16*(1), 8-21. https://doi.org/10.1080/14681811.2015.1050486

Davis, L. S., & Williamson, C. R. (2019). Does individualism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World Development, 123*.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19.104627

Drury, A. J., Elbert, M. J., & DeLisi, M. (2019). Childhood sexual abuse 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sexual offending: New evidence among federal correctional clients. *Child Abuse & Neglect, 95*.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9.104035

Depraetere, J., Vandeviver, C., Beken, T. V., & Keygnaert, I. (2020). Big boys don't cry: A critical interpretive synthesis of male sexual victimization.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1*(5), 991-1010.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18816979

Dauphinais, K. S. (2021). *The 'ideal victim'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victim/offender relationship status, victim self-identity, and observer gender on constructing victim statu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STARS. https://stars.library.ucf.edu/etd2020/847

Depraetere, J., Vandeviver, C., Keygnaert, I., & Vander Beken, T. (2021). Gender role norm conformity and sexual assault risk among male and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Victims & Offenders, 16*(6), 847-868. https://doi.org/10.1080/15564886.2020.1860175

Dutta, N., Giddings, L., & Sobel, R. S. (2022). Does trust always help gender role attitudes? The role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59*, 379-408. https://doi.org/10.1007/s11205-021-02755-y

Dickinson, O. B., & Roberts, M. E. (2025). Attributions of sexual assault: Effects of victim and perpetrator stereotypes, presentation order, and participant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40*(3-4), 629-657.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241253035

Edmonds, E. M., & Cahoon, D. D. (1986). Attitudes concerning crimes related to clothing worn by female victims. *Bulletin of the Psychonomic Society, 24*, 444-446. https://doi.org/10.3758/BF03330577

Elliott, M., Browne, K., & Kilcoyne, J. (1995). Child sexual abuse prevention: What offenders tell us. *Child Abuse & Neglect, 19*(5), 579-594. https://doi.org/10.1016/0145-2134(95)00017-3

Epstein, S., & Pacini, R. (1999). Some basic issues regarding dual-process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experiential self-theory. In S. Chaiken & Y. Trope (Eds.), *Dual process theories in social psychology* (pp. 462-482). Guilford.

Edelstein, R. S., Luten, T. L., Ekman, P., & Goodman, G. S. (2006). Detecting lies in children and adult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0*, 1-10. https://doi.org/10.1007/s10979-006-9031-2

Fabes, R. A., & Martin, C. L. (1991). Gender and Age Stereotypes of Emotional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7*(5), 532-540.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1175008

Felson, R. B., & Feld, S. L. (2009). When a man hits a woman: Moral evaluations and reporting of violence to the police. *Aggressive Behavior, 35*, 477-488. https://doi.org/10.1002/ab.20323

Gottfredson, M. R. (1981). On the etiology of criminal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72*(2), 714-726. https://doi.org/10.2307/1143011

Golding, J. M., Sego, S. A., Sanchez, R. P., & Hasemann, D. (1995). Believability of repressed memories vignettes. Law and Human Behavior, 19(6), 569-592. https://doi.org/10.1037/t38113-000

Glick, P., & Fiske, S. T. (2001). An ambivalent alliance: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as complementary justifications for gender inequ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2), 109-11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6.2.109

Gerber, G. L., Cronin, J. M., & Steigman, H. J. (2004). Attributions of blame in sexual assault to perpetrators and victims of both gender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4*, 2149-2165.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2004.tb02694.x

Grubb, A., & Harrower, J. (2008). Attribution of blame in cases of rape: An analysis of participant gender, type of rape and perceived similarity to the victim.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3*(5), 396-405. https://doi.org/10.1016/j.avb.2008.06.006

Goodman-Delahunty, J., Martschuk, N., Lee, E., & Cossins, A. (2021). Greater knowledge enhances complainant credibility and increases jury convictions for child sexual assaul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624331

Godsoe, C. (2022). The Victim/Offender Overlap and criminal system reform. *Brooklyn Law Review, 87*(4), 1319-1350. http://dx.doi.org/10.2139/ssrn.4494558

Hindelang, M. J., Gottfredson, M. R., & Garofalo, J. (1978). *Victims of personal crime: An empirical foundation for a theory of personal victimization*. Ballinger.

Herzog, S., & Oreg, S. (2008). Chivalr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mbivalent sexism: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rime seriousness judgments. *Law & Society Review, 42*(1), 45-74. https://doi.org/10.1111/j.1540-5893.2008.00334.x

Hayes, S., & Unwin, P. (2016). Comparing the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sexual exploitation of young people in the UK and USA: Insights for social workers. *Revista de Asistenta Sociala, 2016*(1), 27-39.

Hine, B. (2019). "It can't be that bad, I mean, he's a guy": Exploring judgements towards domestic violence scenarios varying on perpetrator and victim gender, and abuse type. In E. A. Bates & J. C. Taylor (Eds.),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New perspectives in research and practice* (pp. 43-57). Routledge.

Hafer, C. L., Rubel, A. N., & Drolet, C. E. (2019). 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subtle victim blame in the absence of explicit blame. *PLoS ONE, 14*(12).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7229

Henry, N., Flynn, A., & Powell, A. (2019).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Trends & Issues i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572*, 1-19.

Huntley, A. L., Potter, L., Williamson, E., Malpass, A., Szilassy, E., & Feder, G. (2019). Help-seeking by male victims of domestic violence and abuse (DV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qualitative evidence synthesis. *BMJ Open, 9*(6).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8-021960

Henry, N., Flynn, A., & Powell, A. (2020). Technology-facilitated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A review.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6*(15-16), 1828-1854.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19875821

Janoff-Bulman, R., & Frieze, I. H. (1983).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reactions to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9*, 1-17.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1983.tb00138.x

Janoff-Bulman, R., Timko, C., & Carli, L. L. (1985). Cognitive biases in blaming the victi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1*, 161-177. https://doi.org/10.1016/0022-1031(85)90013-7

Jenkins, M. J., & Dambrot, F. H. (1987). The attribution of date rape: Observer's attitudes and sexual experiences and the dating situ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875-895.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1987.tb00296.x

Jost, J. T., & Banaji, M. R. (1994). The role of stereotyping in system-jus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false consciousnes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 1-27. https://doi.org/10.1111/j.2044-8309.1994.tb01008.x

Jennings, W. G., Higgins, G. E., Tewksbury, R., Gover, A. R., & Piquero, A. R. (2010). A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the Victim-Offender Overlap.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5*(12), 2147-2174.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09354888

Jeglic, E. L., & Calkins, C. (2016). *Sexual violence: Evidence based policy and prevention*. Springer.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44504-5

Kim, J.-H., & Jang, S. (2014). A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 and a field study: A comparative examination for service failure and recove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41*, 125-132. https://doi.org/10.1016/j.ijhm.2014.05.004

Kloess, J. A., Beech, A. R., & Harkins, L. (2014). Online child sexual exploitation: Prevalence, process, and offender characteristics.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5*(1), 126-139.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13511543

Klettke, B., Hallford, D., & Mellor, D. (2014). Sexting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34*(1), 44-53. https://doi.org/10.1016/j.cpr.2013.10.007

Karasavva, V., & Forth, A. (2022). Personality, attitudinal, and demographic predictors of non-consensual dissemination of intimate imag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7*(21-22).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211043586

Lerner, M. J. (1970). The desire for justice and reactions to victims. In J. Macaulay & L. Berkowitz (Eds.), *Altruism and helping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Lerner, M.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 fundamental delusion*. Springer.

Lipkus, I. (1991). The construction and preliminary validation of a glob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and the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2*(11), 1171-1178. 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91)90081-L

Landström, S., Strömwall, L. A., & Alfredsson, H. (2016). Blame attributions in sexual crimes: Effects of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victim behavior. *Nordic Psychology, 68*(1), 2-11. https://doi.org/10.1080/19012276.2015.1026921

Lee, M.-S., & Shen, P. (2018). Recent bullying trends in Japanese schools: Why methods of control fail. In J. Deakin et al. (Eds.), *The Palgrav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hool discipline, surveillance, and social control* (pp. 149-167).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71559-9_8

Long, L. J. (2021). The ideal victim: A Critical Race Theory (CRT) approa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27*(3), 344-362. https://doi.org/10.1177/0269758021993339

Li, Z., & Zheng, Y. (202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ape victim blame: The roles of gender-specific system justification and hostile sexism.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251355620

Muehlenhard, C. L., Friedman, D. E., & Thomas, C. M. (1985). Is date rape justifiable? The effects of dating activity, who initiated, who paid, and men's attitudes toward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9*, 297-309.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1985.tb00882.x

McCaul, K. D., Veltum, L. G., Boyechko, V., & Crawford, J. J. (1990). Understanding attributions of victim blame for rape: Sex,violence, and foreseeabilit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1), 1-26.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1990.tb00375.x

Maes, J. (1994). Blaming the victim: Belief in control or belief in justic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7*(1), 69-90. https://doi.org/10.1007/BF02333823

Mankowski, E. S., & Maton, K. I. (2010). A community psychology of men and masculinity: Historical and conceptual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5*(1-2), 73-86. https://doi.org/10.1007/s10464-009-9288-y

Marganski, A., & Fauth, K. (2013). Socially interactive technology and contemporary dating: A cross-cultural exploration of deviant behaviors in the modern, evolving technological world. *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view, 23*(3), 357-377. https://doi.org/10.1177/1057567713513797

Muftić, L. R., Finn, M. A., & Marsh, E. A. (2015). The victim-offender overlap,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sex: Assessing differences among victims, offenders, and victim-offenders. *Crime & Delinquency, 61*(7), 899-926. https://doi.org/10.1177/0011128712453677

Machado, A., Hines, D. A., & Matos, M. (2016). Help-seeking and needs of male victim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Portugal.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7*, 255-264. https://doi.org/10.1037/men0000013

McGlynn, C., & Rackley, E. (2017).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7*(3), 534-561. https://doi.org/10.1093/ojls/gqw033

Mori, C., Cooke, J. E., Temple, J. R., Ly, A., Lu, Y., Anderson, N., Rash, C., & Madigan, S. (2020). The prevalence of sexting behaviors among emerging adults: A meta-analysi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9*, 1103-1119.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20-01656-4

McGlynn, C., & Johnson, K. (2021). Criminalising cyberflashing: Options for law reform.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85*(3), 171-188. https://doi.org/10.1177/0022018320972306

Mclocklin, G., Kellezi, B., Stevenson, C., & Mackay, J. (2024). Disclosure Decisions and Help-Seeking Experiences Amongst Victim-Survivors of Non-Consensual Intimate Image Distribution. *Victims & Offenders*, 1-27. https://doi.org/10.1080/15564886.2024.2329107

O'Donohue, W., Smith, V., & Schewe, P. (1998). The credibility of child sexual abuse allegations: Perpetrator gender and subject occupational status. *Sexual Abuse: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Treatment, 10*(1), 17-24. https://doi.org/10.1177/107906329801000103

Oldmeadow, J., & Fiske, S. T. (2007). System-justifying ideologies moderate status = competence stereotypes: Roles for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 1135-1148. https://doi.org/10.1002/ejsp.428

Ogloff, J. R. P., Cutajar, M. C., Mann, E., Mullen, P., Wei, F. T. Y., Hassan, H. A. B., & Yih, T. H. (2012). Child sexual abuse and subsequent offending and victimisation: A 45-year follow-up study. *Trends and Issues in Crime and Criminal Justice, 440*.

Pennington, N., & Hastie, R. (1991). A cognitive theory of juror decision making: The story model. *Cardozo Law Review, 13*(2-3), 519-557.

Plant, E. A., Hyde, J. S., Keltner, D., & Devine, P. G. (2000). The gender stereotyping of emotion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4*(1), 81-92.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2000.tb01024.x

Pozzulo, J. D., Dempsey, J. L., & Crescini, C. (2010). Factors affecting juror decisions in historic child sexual abuse cases involving continuous memories.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7*(9), 951-964. https://doi.org/10.1177/0093854810373587

Pemberton, A. (2012). Just-world victimology: Revisiting Lerner in the study of victims of crime. In H. Morosawa, J. J. P. Dussich, & G. F. Kirchhoff (Eds.), *Victimology and human security: New horizons* (pp. 45-69). Wolf Legal Publishers.

Powell, A., & Henry, N. (2017). *Sexual violence in a digital age*. Palgrave Macmillan. https://doi.org/10.1057/978-1-137-58047-4

Rubin, Z., & Peplau, L. A. (1973).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reactions to another's lot: A study of participants in the National Draft Lotter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9*(4), 73-93. https://doi.org/10.1111/j.1540-4560.1973.tb00104.x

Rogers, P., & Davies, M. (2007). Perceptions of victims and perpetrators in a depicted child sexual abuse case: Gender and age factor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2*(5), 566-584.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06298827

Reich, B., & Wang, X. (2015). And justice for all: Revisiting the Global Belief in a Just World Scal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8*, 68-76.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5.01.031

Richards, T. N., Tillyer, M. S., & Wright, E. M. (2017).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the overlap of perpetration and victimization: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sexual, and emotional abuse in childhood. *Child Abuse & Neglect, 67*, 240-248.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17.02.037

Ralston, K.M. (2020). “If I was a ‘real man’”: The role of gender stereotypes in the recovery process for men who experience sexual victimization. *The Journal of Men's Studies, 28*(2), 127-148. https://doi.org/10.1177/1060826519864475

Rechenberg, T., & Schomerus, G. (2023). The stronger and the weaker sex-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perception of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d 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 in childhood. A scoping review. *Child Abuse & Neglect, 140*. https://doi.org/10.1016/j.chiabu.2023.106131

Schuller, R. A., Smith, V. L., & Olson, J. M. (1994). Juror’s decision in trials of

battered women who kill: The role of prior beliefs and expert testimony.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4*(4), 316-337.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1994.tb00585.x

Sugarman, D. B., & Boney-McCoy, S. (1997). Impact of expert testimony on the believability of repressed memories. *Violence and Victims, 12*(2), 115-126.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12.2.115

Schreck, C. J., Wright, R. A., & Miller, J. M. (2002). A study of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antecedents of violent victimization. *Justice Quarterly, 19*(1), 159-180. https://doi.org/10.1080/07418820200095201

Seelau, E. P., Seelau, S. M., & Poorman, P. B. (2003). Gender and role-based perceptions of domestic abuse: Does sexual orientation matter?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21*, 199-214. https://doi.org/10.1002/bsl.524

Sakallı-Uğurlu, N., Yalçın, Z. S., & Glick, P. (2007). Ambivalent sexism,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empathy as predictors of Turkish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rape victims. *Sex Roles, 57*(11-12), 889-895.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07-9313-2

Sleath, E. & Bull, R. (2010). Male rape victim and perpetrator blaming.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25*(6), 969-988.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09340534

Schwöbel-Patel, C. (2018). The 'Ideal' Victim of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9*(3), 703-724. https://doi.org/10.1093/ejil/chy056

Stuart, S. M., McKimmie, B. M., & Masser, B. M. (2019). Rape perpetrators on trial: The effect of sexual assault–related schemas on attributions of blam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4*(2), 310-336.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6640777

Said, I., & McNealey, R. L. (2023). Nonconsensual distribution of intimate images: Exploring the role of legal attitudes in victimization and perpetration.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8*(7-8), 5430-5451.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221122834

Sparks, B., Stephens, S., & Trendell, S. (2023).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Victim-perpetrator overlap and risk-related correlates of coerced sexting, non-consensual dissemination of intimate images, and cyberflash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4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23.107879

Triandis, H. C. (2001).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9*, 907-924. https://doi.org/10.1111/1467-6494.696169

Taylor, T. J., Peterson, D., Esbensen, F. A., & Freng, A. (2007). Gang membership as a risk factor for adolescent violent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44*(4), 351-380. https://doi.org/10.1177/0022427807305845

Tziallas, E. (2015). Gamified eroticism: Gay male "social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and self-pornography. *Sexuality & Culture, 19*, 759-775. https://doi.org/10.1007/s12119-015-9288-z

Van den Bos, K., & Maas, M. (2009). On the psychology of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Exploring experiential and rationalistic paths to victim blam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12), 1567-157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9344628

Vogel, D. L., Heimerdinger-Edwards, S. R., Hammer, J. H., & Hubbard, A. (2011). "Boys don't cry": Examination of the links between endorsement of masculine norms, self-stigma, and help-seeking attitudes for men from diverse background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8*, 368-382. https://doi.org/10.1037/a0023688

Valor-Segura, I., Expósito, F., Moya, M., & López, K. (2014).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Spain and Cuba: The same reality, two different visions / Violencia hacia la mujer en España y Cuba: una misma realidad, dos visiones diferen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9*(1), 150-179. https://doi.org/10.1080/02134748.2013.878573

Voogt, A., Klettke, B., Thomson, D. M., & Crossman, A. (2020). The impact of extralegal factors on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child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Psychology, Crime & Law, 26*(9), 823-848. https://doi.org/10.1080/1068316X.2020.1742336

Whatley, M. A. (1996). Victim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to rape victims: A meta-analysis.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1*(2), 81-95. https://doi.org/10.1016/1359-1789(95)00011-9

Weiss, K.G. (2010). Male sexual victimization : Examining men's experiences of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Men and Masculinities, 12*(3), 275-298. https://doi.org/10.1177/1097184X08322632

Wu, T. (2016). *The attention merchants: The epic scramble to get inside our heads*. Knopf.

Westfall, R. S., Millar, M. G., & Lovitt, A. (2019).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n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sychological Reports, 122*(2), 536-549. https://doi.org/10.1177/0033294118763172

Walfield, S. M. (2021). "Men cannot be raped": Correlates of male rape myth accepta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13-14), 6391-6417.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8817777

Zvi, L., & Shechory-Bitton, M. (2020). Police officer perceptions of non-consensual dissemination of intimate imag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02148

Zauner, J. (2021). The continuum of symbolic violence: How sexting education neglects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dismisses perpetrators' responsibility, and violates rights to sexual autonomy. *Journal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5*(3), 483-498. https://doi.org/10.1332/239868021X16123478358067

岡安孝弘・高山巌. (2000). 中学校におけるいじめ被害者および加害者の心理的ストレス. *教育心理学研究, 48*(4), 410-421. https://doi.org/10.5926/jjep1953.48.4_410

二、中文部分

何春蕤（1994）。*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皇冠。

周愫嫻（2014）。青少年網路虛擬身分與網路被害、不當行為。*犯罪與刑事司法研究，22*，45-73。

陳婷玉（2008）。解放？壓迫！網路色情聊天室中的兩性互動。*資訊社會研究，14*，223-260。 https://doi.org/10.29843/JCCIS.200801.0007

廖美蓮（2020）。網路性誘拐—兒少影像性剝削實務挑戰。*當代社會工作學刊，11*，35-80。

蔡宜家、林俐如、許家毓、顧以謙（2021）。*性侵害案件之檢察書類分析──以偵查結果為中心之實證研究*（109-110 年自體研究案成果報告）。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三、其他資料

Cholodenko, L., Dinner, M, & Grant, S. (Director). (2019). *Unbelievable* [Film]. Netflix.

# 附錄一　問卷（以情境五為例）

## 散佈性影像陳述內容之研究

您好：

首先，由衷感謝您參與本實驗。

待會您將閱讀一段情境文字，請於閱畢後回答問題並填寫人口學資訊。總題數共21題，總作答時長預計為10分鐘左右；填畢送出後，實驗結束。

本實驗採匿名形式，而本研究所蒐集之資訊僅研究者本人可查閱，並將保存至2026年8月即予刪除；若有蒐集可辨識之個人資訊，將對其進行編碼，並與實驗之作答內容分開存檔。

本研究採整體分析，您不會被辨識出個人資訊。本研究將發表於學位論文，且無任何衍生之商業利益。

您可自由決定是否繼續參與本實驗，亦可於實驗中途選擇不參與，屆時直接關閉網頁即可，無須有任何壓力。本實驗會刪除未完成作答之資料，請放心參與、安心填寫。

**點擊「下一頁」即表示您已閱畢此說明頁，亦代表您已知悉本實驗之注意事項並同意上述內容。**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耐心閱讀，亦感謝您撥冗參與。學生深感榮幸，並在此祝您身體健康、事事順心。

國立臺北大學　犯罪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沈伯洋 博士
指導教授　周愫嫻 博士
研究生　林郁琤 敬上

民國 115 年 02 月 01 日

下一頁

於正式進入實驗前，請先閱讀下列條文。

**民法第184條第1項：**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民法第195條：**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10條第8項第2款與第4款：**

稱性影像者，謂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

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

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中華民國刑法第319-3條第1項：**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其性影像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下一頁

一、閱讀情境後，回答問題。

**以下為小奇（生理男性）於其個人網站所寫下的自身經歷：**

**「我是小奇，是一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單身未婚。**

**猶記得11月7日那天，我工作壓力實在太大，想要轉換心情，於是我去了租屋處附近的酒吧，看能否認識些新朋友。到酒吧後，我隨意選個吧檯的位置坐下，發現隔壁是位身材窈窕的女性，我便向他搭話。聊了十分鐘左右，得知他叫做阿婷，雖是已婚已有丈夫，但他身上仍散發出一種特殊的淑女氣質，使我著迷不已。**

**我與阿婷一見如故、相談甚歡，我真的非常喜歡他。約莫聊到凌晨一點，我主動邀他至我的租屋處，他也答應了。那晚我們發生了性行為，而阿婷也用手機拍下了我的裸照當作紀念。阿婷的老公散佈出去的那張照片，就是這時候拍下的！**

**12月5日那天，我看到網路上到處都在轉傳這張我的裸照，我都快瘋了。一問之下才得知，是阿婷的老公在使用阿婷的手機時發現了這張照片，一氣之下就把它上傳到各個社群網站。**

**我承認我不該在知道阿婷已婚的狀況下，還一直約阿婷來我家，我知道我侵害了別人的配偶權，但阿婷的老公也不能用這種方式損害我的名譽！」**

＊

您是否相信小奇的陳述內容？

*單選*

- ○ 1非常不相信
- ○ 2不相信
- ○ 3有點不相信
- ○ 4有點相信
- ○ 5相信
- ○ 6非常相信
- ○ 不知道/看不懂

下一頁

二、請根據您對前頁情境的記憶，回答以下問題。

＊
**1.小奇的生理性別為？**

*單選*

- ○ 男性
- ○ 女性
- ○ 不知道

＊
**2.是誰在網路上散佈小奇的裸照？**

*單選*

- ○ 阿婷的丈夫
- ○ 阿婷丈夫的姊姊
- ○ 不知道

＊
**3.小奇在自己的裸照被散佈前，曾經做出何種加害行為？**

*單選*

- ○ 殺人
- ○ 散佈他人性影像
- ○ 侵害他人配偶權
- ○ 無
- ○ 不知道

下一頁

三、請根據您的直覺，回答以下七道題目。

＊

**1. 我覺得大多數人都會得到他們應當獲得的。**

*單選*

- ◯ 1非常不同意
- ◯ 2不同意
- ◯ 3有點不同意
- ◯ 4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 5有點同意
- ◯ 6同意
- ◯ 7非常同意

＊

**2. 我覺得一個人的努力終會被注意到並得到相應的報酬。**

*單選*

- ◯ 1非常不同意
- ◯ 2不同意
- ◯ 3有點不同意
- ◯ 4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 5有點同意
- ◯ 6同意
- ◯ 7非常同意

＊

**3. 我覺得人們得到的獎賞與懲罰都是他們應得的。**

*單選*

- ◯ 1非常不同意
- ◯ 2不同意
- ◯ 3有點不同意
- ◯ 4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 5有點同意
- ◯ 6同意
- ◯ 7非常同意

＊

**4. 我覺得人們遭遇的不幸是他們自己引來的。**

*單選*

- ◯ 1非常不同意
- ◯ 2不同意
- ◯ 3有點不同意
- ◯ 4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 5有點同意
- ◯ 6同意
- ◯ 7非常同意

＊

**5. 我覺得人們終將得到他們理所應得的。**

*單選*

- ◯ 1非常不同意
- ◯ 2不同意
- ◯ 3有點不同意
- ◯ 4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 5有點同意
- ◯ 6同意
- ◯ 7非常同意

＊

**6. 我覺得世上的賞與罰的報應是公平的。**

*單選*

- ◯ 1非常不同意
- ◯ 2不同意
- ◯ 3有點不同意
- ◯ 4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 5有點同意
- ◯ 6同意
- ◯ 7非常同意

＊

**7. 我覺得這個世界基本上還是很公平的。**

*單選*

- ○ 1非常不同意
- ○ 2不同意
- ○ 3有點不同意
- ○ 4既不同意也不反對
- ○ 5有點同意
- ○ 6同意
- ○ 7非常同意

下一頁

四、請完成下列人口學資訊。

＊

**1.您的生理性別為：**

*單選*

- ○ 男性
- ○ 女性
- ○ 其他:

＊

**2.您的性別認同為：**

*單選*

- ○ 男性
- ○ 女性
- ○ 其他:

＊

**3.您於民國哪一年出生？**

*只可輸入數字*

＊

**4.您的最高教育程度：**

*單選*

- ○ 國中（含）以下
- ○ 高中職
- ○ 大學/專科
- ○ 研究所（含）以上
- ○ 其他:

＊

**5.您目前的就業狀態：**

*單選*

- ○ 無
- ○ 兼職工作
- ○ 全職工作
- ○ 已退休
- ○ 其他:

＊

**6.您目前的職業領域：**

全職工作者填答即可，兼職工作者請填「無」。
若無法辨識自身工作屬何領域，請於「其他」處填寫職業名稱。

*單選*

- ○ 無
- ○ 家庭主夫/婦
- ○ 農、林、漁、牧業
- ○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 ○ 製造業
- ○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 ○ 營建工程業
- ○ 批發及零售業
- ○ 運輸及倉儲業
- ○ 住宿及餐飲業
- ○ 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 ○ 金融及保險業
- ○ 不動產業
- ○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 ○ 支援服務業
- ○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 ○ 教育業
- ○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 ○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 ○ 其他服務業
- ○ 其他:

*

**7.您本人是否曾經從事法律相關工作?**

(不包括立法委員、調解委員，或是法院內一般行政人員)

*單選*

- ○ 有
- ○ 沒有
- ○ 其他:

**8.若您現為大學生/研究生，您目前的科系領域：**

現非大學生/研究生者，請點選「不適用」。

*單選*

- ○ 教育
- ○ 人文
- ○ 社會科學
- ○ 法政
- ○ 管理
- ○ 醫藥衛生
- ○ 農
- ○ 理工
- ○ 資訊
- ○ 大眾傳播
- ○ 其他:
- ◉ 不適用

*

**9.您目前的婚姻狀態：**

*單選*

- ○ 未婚
- ○ 已婚
- ○ 離婚
- ○ 其他:

*

**10.您的宗教信仰：**

*單選*

- ○ 無
- ○ 佛教，有皈依
- ○ 佛教，沒皈依
- ○ 道教
- ○ 天主教
- ○ 基督教
- ○ 其他:

下一頁

再次感謝您撥冗參與並耐心填答。
您的參與是本研究不可或缺且至關重要的一部份，非常感謝。

國立臺北大學　犯罪學研究所
研究生　林郁琤

# 附錄二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14 年度訴字第 229 號判決

## （摘錄）

(一) 被告乙○○於民國 112 年 9 月間某日晚上，無意間發現其配偶即第三人陳○○手機內存有與原告所拍攝之性影像，因此欲對原告提起侵害配偶權之民事訴訟，並將陳○○所留存於手機之性影像予以截圖，作為民事訴訟損害賠償起訴之依據，復於民事訴訟過程中，因被告甲○○之關心，竟基於妨害性隱私之犯意，於 112 年 11 月 8 日將準備在民事訴訟提出之證據即原告與陳○○之性影像照片縮圖（下稱系爭性影像）以 LINE 通訊軟體傳送予甲○○，以此方式供甲○○觀賞系爭性影像。其後，甲○○取得系爭性影像後，竟基於妨害原告性隱私之犯意，於 113 年 1 月 19 日 14 時許，以其持有之手機所存取系爭性影像欲供第三人許陳○○觀賞，惟因許陳○○不願多事，未加詳細看即表示拒絕，嗣經許陳○○轉告原告，原告始知上情。

(二) 系爭性影像因乙○○故意傳送甲○○看，甲○○基於損害原告之名譽將之外流，致原告社會地位受批判，尤以與公眾利益無涉之系爭性影像卻成為甲○○傳布予許陳○○觀賞。

# 著作權聲明

論文題目：被害者也有預設值？——散佈性影像中被害者陳述可信度之研究

論文頁數：74 頁

系所組別：犯罪學研究所

研究生：林郁琤

指導教授：沈伯洋、周愫嫻

畢業年月：2026 年 6 月

本論文著作權為林郁琤所有，並受中華民國著作權法保護。